

第三期 (2023 年 5 月)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



组织 宣传 学习

联系&订阅: RSF-kan@tutanota.com

(向我们的邮箱发送“订阅”，即可在每月 27 号收到杂志)



RSF 编辑部制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FRONT

目录

关于我们.....	3
第一部分 理论阵地.....	7
革命的自觉组织和群众的自发组织及我们当下的任务.....	8
我们今天离革命的距离和革命的现实工具.....	21
革命的规律、组织工具的规律、革命组织的规律.....	29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定义和产生条件.....	37
第二部分 路线斗争.....	42
布站方：.....	43
融工的战略与策略——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谋略.....	43
炮打以东风为代表的泥潭主义路线，真理与权威的抉择，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46
东风方：.....	49
靠熟人网络发展地下网络，然后再夺权——评大群老管理虚幻的融工策略.....	49
线上与线下工作结合是左派线上组织的必由之路.....	51
第三部分 社会社评.....	54
评我国农业领域中的最新变动.....	55
评汕尾外卖骑士罢工事件.....	64
第四部分 同志来稿.....	70
一些关于讽刺“左”的现象.....	71
谈谈“真理标准”.....	73
第五部分 斗争艺术.....	82
翻墙原理与注意事项.....	83

关于我们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是致力于在中国推进一场新的社会主义革命以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我们创立《革命社会主义阵地》旨在通过对一些普遍公认的马列毛主义基本原则进行梳理和分析，以帮助马列毛主义者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从而推动中国革命力量的进步。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在工人阶级中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打下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此外我们也十分乐意帮助任何真诚的想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同志们进一步提高知识文化素养和必要的技术能力；我们认为这些素养和能力一方面是运动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也多少可以帮助同志们少走弯路。（例如：各种合法斗争的方法、发展秘密组织的经验、把非法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的艺术、和反动警察斗争的经验、信息安全技术）

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和资产阶级全面复辟以来，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中国劳动人民就从社会的主人沦落为了雇佣奴隶。此后直到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处于被资产阶级完全专政的地位，而毫无任何实际权利可言。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这世界上绝不会有人甘愿永远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甘愿永远任人摆布。中国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哪怕一秒。而且，随着近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导致的经济下行趋势越发明显，统治阶级必然会向工人阶级发动越来越多的进攻，因此工人阶级的斗争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必然会有重大提升，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工业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是头一次见到了。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由此发现一对矛盾，那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越来越需要进行斗争（现阶段很多情况下实际是“反击”）同中国工人阶级缺乏进行斗争的必要“武器”间的矛盾。我们都知道，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一般都具有非常强大，十分高效的维稳能力（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千秋万代，保证雇佣奴隶制能够延续到永远）。中国的统治阶级（独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容任何挑战，哪怕是最普通的经济斗争也会招致最无情的打击，在这种法西斯国家里连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需求都难以做到。面对这样的法西斯怪物，我们的工人们除了用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外几乎别无他法（当然了，我们这里并不是说只要非法斗争）。而工人们除了组织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进行斗争的武器。我们谁能够设想工人们能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赢得哪怕是一场小规模、最初步的经济斗争的胜利？即使是最初步的经济斗争也是需要一定的组织宣传联络工作的，更不要说未来的政治斗争乃至最终的阶级决战了。一句话：没有组织就不可能做到工人阶级的联合，而没有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力量自然也就无力应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疯狂进攻。

然而不幸的是，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人都知道，虽然工人们非常需要组织但我们最缺乏的却恰恰又是这个武器。要用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从而“武装”工人阶级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客观环境极端恶劣。另一方面则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才刚刚开始行动，还没有广泛的同工人阶级深刻的结合起来。

中国的统治阶级根本容不得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群众组织，即使是前几年那些对资产阶级统治完全无害甚至是对现有秩序进行有益补充的公益性非政府组织（他们搞得东西和现在未明子之流的活动差不多）都遭到了最严厉的打击。面对这种情况自然就有些人跳出来，告诉我们现在要做的首先应该是等待合适的时机，因为根本没有可能在当下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推进运动的发展。对于这种人，我们称之为“等等主义者”。诚然，真正的革命者也会分析困难，

但真正的革命者分析困难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克服困难以实现最终的目的，而绝非逃避困难。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了“等等主义者”的“高论”，那么即使当机会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把握住机会，更不必谈无产阶级专政了。试想在我们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即使统治阶级真的面临巨大的统治危机，群众即使真的无法再继续往日生活了，但那时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群众会跟着那些从未同他们有过实际联系却又自封为“革命家”高谈阔论的人走吗？到时候整个运动最好的结局估计也就是像德国十一月革命一样被回过神来的统治阶级粉碎罢了。我们认为，中国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革命的主观条件是否成熟。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危机只是促成革命的客观条件之一罢了，而真正能使革命危机转变为成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是革命主观力量的充足准备。我们认为革命主观力量准备充足与否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革命者和广大劳动人民是否走在相对正确的政治路线上，这是纲领性的问题，是决定一切的根本问题所在；第二方面是我们是否具备具体的斗争实践方法、必要的物质和技术等等现实物质条件。

虽说第一方面是根本性的，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就要抛下第二方面不管。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和革命斗争所必需的现实物质条件严重不足的这一矛盾呢？毛主席说得好“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1]一句话，我们不是成为了大多数才去斗争的，而是在斗争中逐渐成为大多数；我们不是在具备了各种物质条件后才去运动的，而正是在运动中逐渐具备各种物质条件的。（当然了这绝不是说我们应该盲目的去送命，而是在具体的斗争中快速的学习并成长起来）而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归结于正确的路线。也就是说，要争取到必要的现实物质条件应该在坚持正确道路的前提下先投入到斗争中去，而绝非一味的等待。当然了，这世间绝不存在什么先验的绝对真理，所谓的正确路线实际上也就是在历史和现实的无数阶级斗争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那些理论和经验罢了，而这些理论和经验又反过来指导我们今后的斗争。这也正是马列毛主义的生命所在。

近来中国阶级斗争的事实也证明了，虽说中国统治阶级确实非常强大，但也绝非是不可战胜的。前段时间以白纸运动为代表的一些列群众运动不就最终迫使当局放弃了极端反动的“清零政策”了吗？（当然了，有的人肯定会说全面开放都是因为地方没钱了，但假如真是如此，又是什么因素迫使政府在十月份都还坚持要防疫到底却又在十一月份突然来了个180°大转向呢？）然而这个时候估计又有些“革命家”跳出来准备“实践”一番了，从成天专注于喊口号、做大梦的机会主义小团体“中共（毛）”[2]，到部分贡派的朋友们的所谓“中国毛主义者小组”（他们僵化的简直震撼世人，他们竟打算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抵制所谓的“资产阶级议会选举”!!!）[3]再到最近成立的所谓“革命共产主义联盟”都是如此。这些朋友们在实际上是把共产党当成某种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了，当成是某种只需要几个自命为革命者的人坐在一起开个会再出份宣言就可以变出来的东西了。但不幸的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不是戏法师傅，绝不能从真空中变出一个党来，我们也相信他们也同样不具备此种神奇魔力。事实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最高级别的工人组织。换言之，先锋队是在大量群众工作，遍布全国的、和工人阶级有深刻联系的马列毛主义小组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的发展，最终形成的一个强大组织；所谓的成立大会，只不过是把先锋队存在的既定事实给摆上台面罢了。从这个逻辑来看，目前及之后一段时间里，任何在中国大陆地区成立的所谓“无产阶级先锋队”顶天不过是一群左翼知识分子自娱自乐的俱乐部罢了。

回过头来，我们刚才谈到了现阶段中国工人阶级越来越需要进行斗争而又缺乏斗争的武器的现象。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现阶段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工人们尚未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应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暴政。（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还不存在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意义上的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无产阶级）群众还没有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海洋里爬上岸；马列毛主义尚未被群众接受并成为劳动人民自己的意识形态。一句话：革命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同革命的阶级相结合。而我们正是要使革命的阶级逐步具有革命的意识形态，使中国劳动者能自觉的捍卫自身阶级利益，并最终走向彻底解放自己的光辉大道。而要改变现状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认为需要有一批具有各种必要素养的革命知识分子，而这也就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他们将首先联合起来，去到社会各阶层中去学习、去实践、去宣传、去组织、去斗争。当然了，在一开始我

们还没有足够力量的时候，我们应该主要到工人里去，特别是到产业工人那里去，他们永远都是我们的基本盘。

但是如果我们这些自命为马列毛主义者的人，连自己都不能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一个相对清晰科学的认知又怎么能到群众中去开展各项工作呢？如果我们自己对革命的学说都不能有一个基本理解的话又怎么去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呢？如果我们没有发展革命组织的必要知识素养和维护群众利益的必要手段怎么能够代表群众并使他们走向革命呢？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一种渠道，来把这么多年来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所形成的一些基本认识所总结出来并尝试加以分析，以促进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自身在基本理论上的进步，为不久的将来所进行的群众工作打下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而这就是我们这份杂志存在的主要目的。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指责我们搞宗派主义，不懂得联合各种泛左派。但问题在于什么是“联合”？如果我们把“联合”定义为“一定范围内的个人或不同团体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在一定原则下选择的统一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同任何人联合的目的都必然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最高要求而服务的。然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是讲理论分析和实践证明的，我们的理论和道路绝不是哲学家或伟大导师从真空中凭空想出来的绝对正确的律令，而是在过去一百五十多年里，无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具体的、血与火的阶级斗争实践中一步步总结出来，并反复被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代表的无数具体革命实践和今天仍在印度和菲律宾等地进行的人民战争所反复检验的理论；是在实践中能够进行自我反思并不断发展的理论。（不然是怎么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马列毛主义的呢？）而历史和现实也同样无数次的证明了其他各种各样的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妙论从来就没有同工人运动真正大规模的结合过，几乎没有为运动争取到半点的突破，反而很多时候在起阻碍作用，更不要提靠它们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了。且不谈已经沦为和自由派没什么实际区别的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第二国际时代就已经被驱逐出去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一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的托派分子也就那样。托派分子所鼓吹的什么“工农对立”，就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成为过主要矛盾；还有他们热衷讨论的所谓“官僚问题”，实际上和自由派天天痛骂的所谓“秦制”一样，基本就是一个空洞的靶子和好用的帽子；至于那荒谬的“世界革命论”则是要求不顾世界各国运动发展的自身逻辑、不相信各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以极端傲慢的态度要求革命率先胜利的国家不顾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强行推进所谓“世界革命”，这种策略不但难以推动世界革命，甚至很可能把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政权也葬送进去。

对于那些自称为“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人也就是贡萨罗派还值得分辨一番。我们相信绝大部分贡派朋友都是多少有一定理论基础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是被极少数顽固的接近于修正主义者甚至已经是修正主义者的贡派所误导了的。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只要他们继续坚持学习基础理论，并多多加以反思的话，肯定是可以继续进步并最终投向我们的队伍的；但为了帮助他们实现进步，我们反而要不断指出他们目前的问题所在。而对于极少数十分顽固的贡派分子，只要他们没啥现实影响力我们就几乎可以无视他们，而假设有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采取对待修正主义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了。事实上，贡派和马列毛主义主流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已经持续很久了，并且还将持续下去，而我们的一些同志也已经在部分国内合法公开的平台上同他们交锋过好多次了，写了不少优秀的文章。因此我们的杂志相对而言应该不会涉及太多这方面的内容了。（当然，肯定还是会有有的）

实际上泛左翼的问题绝不只有我们刚谈的那么一些，但在这里实在没法全面展开论述了，我现在只谈一点：要想真正促进那些泛左派的人进步，要想真正实现广泛的联合，要的绝不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去妥协或勉强接受对方的所谓“妥协”，而是要坚持路线斗争，坚持用马列毛主义的方法逻辑来指出他们的正确和错误的地方以及为什么正确或错误；唯有这样才能够在革命的旗帜下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否则当我们在错误的路线下同泛左实现了所谓的“联合”又有有什么用呢？这样的“联合”甚至会让我们把自己本来相对正确的东西也被迫丢失了，实在是得不偿失。而若是我们能够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共识总结起来，锻造成一把利刃，并在具体事例和运动的发展中实际运用这把利刃来深刻的解剖各种现实问题的话，那么任何真正愿意推进革命而又具有基本的反思能力的人反而更容易摒弃原先错误的东西，转而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从而实现真正的大联合。

还有的同志可能会觉得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各种墙内的网络平台上，用视频之类的途径进行所谓的宣传工作。事实上我们的工人们并不会花大把时间在这些平台上广泛活跃，他们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在百忙之余抽出时间去网上大量的看这些视频。通过这种倍受限制的方法去缓慢的直接影响部分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任务不是我们编辑部的主要任务。而对于有更高追求的马列毛主义者而言，则更不会把看视频当作提升自己的主要途径。另外，即使是从单纯的信息传播效率的角度看，汉字也要比任何视频或音频的效率高出得多，尤其是在传播严肃内容的时候更是如此。此外更不要说我们在那些公开的网络平台上只能做最初步的政治宣传而任何一点涉及关键内容的东西都是难以涉及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绝不是要像“火星报”一样现在就要扮演一个能够团结起全国各地活动小组的全国政治报的角色。这是因为现阶段中国根本还不存在什么马列毛主义者和工人们相结合的活动小组。我们还在 1895 年之前，我们尚未建立“彼得格勒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既然没有什么成熟的小组可以团结，那么现在也就自然不会有“火星报”，我们只是要促进我国的马列毛主义者往这个方面发展，从一个更基础的地方开始步步做起；从这点看，以叛徒“米宁”为代表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前几年搞的什么“全华政治报”是非常奇异搞笑的存在。诚然，布站的马列毛主义者们也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很多方面，他们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我们的老师。但问题在于他们的不少判断（例如那“五个基本判断”）都是至少十年前做出的了，这些判断在当时大多是非常深刻的，有的内容放在今天都极具价值，而有的地方在今天却显得过时了，例如将当下的中国判定为所谓的“二流帝国主义”（实际上，我们认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仅次于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是目前唯一有野心又有能力同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势力）。在有的问题上，布站的同志们又谈的太少了，例如台湾问题和女性解放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等等。现在我们的经验确实十分有限，对于很多问题不可能现在就能做出非常完备和严谨的分析与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连一些最初步的分析与判断也做不到，在这点上我们是希望能够超越我们的老师的。虽说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将基本共识总结起来并尝试进行分析，但这绝不是说我们的杂志就只局限于什么“纯粹的理论分析”。实际上，哪怕是最好的东西，哪怕是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一旦脱离了社会现实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因此我们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我们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对现实的具体情况所进行的分析。当然，我们还需要全国优秀的马列毛主义同志和先进群众们的参与与帮助。

对于未未来具体会发生什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对此我们只有两句话可说：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如果要持续阅读我们的作品，请联系我们在下面段落标注的邮箱地址，发送“订阅”的内容。

如果是有意愿或问题、以及有投稿或其他事情的读者也请通过邮箱联系我们，我们会尽力回复。（当然如果是恶意破坏的行为或有安全风险我们则不会回复。）

我们的邮箱地址：RSF-kan@tutanota.com

对读者朋友们的提醒：请大家使用非国内的、相对安全的邮箱来联系我们或当作接收订阅的邮箱。如 Protonmail、Tutanota、Gmail 等。如果使用国内邮箱来联系我们并作为接收刊物的邮件，则不能确保信息的安全性，可能会被官方审查。如 qq、163 等邮箱。

第一部分 理论阵地

第一部分是本刊物最重要的部分。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革命的理论是我们革命运动中主观力量的精神条件，是我们政治路线的直接体现，也是革命的灵魂所在。我们在这部分集中创作和整编了一些其他国内外同志的优秀文章，用来丰富我们的内容和我们的思想。对于推动我国大部分马列毛主义者和其他进步群众们的理论成长，以及指导目前我国各种早期幼年的进步组织的基本路线和发展方法有重要意义。

由于读者和同志们的要求，以及我们的部分实践的需要，还有最近发生的关于布站和东风频道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们在第三期月刊的这一部分中加入了许多 **RSF** 编辑部对于相关实践经验和组织活动上的理论问题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革命的自觉组织和群众的自发组织及革命分子放下的方向

RSF 编辑部

一. 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的区别

今天我国的革命组织（包括我们在内）也都还很初级，这种初级往往不仅体现在其组织规模和革命工作及分工的发展上，在很多地方也会体现在其组织成员和主要份子对组织任务持有的狭隘的见解上。

这种狭隘的见解是革命运动早期发展中的必然阶段，这种情况也曾在历史上出现过。我们有必要吸取历史经验来帮助我们克服现在的不足并继续前进。

假使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把政治斗争的概念和“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概念等同起来，那他自然也就把“革命家的组织”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和“工人的组织”这个概念等同起来。事实上也真是这样，所以在我们谈论组织时，简直就是各讲各的话。例如，我现在还记得我同从前不认识的一位颇为彻底的“经济派”谈话的情形。当时我们是在谈《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这本小册子，我们两人很快地就一致认为这本小册子的基本缺点是忽视了组织问题。我们满以为我们彼此是意见相同的，但是……当继续谈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两个人说的不是一回事。我的对话人责备该书作者忽视了罢工储金会和互助会等等，而我指的却是为“实现”政治革命所必需的革命家组织。在这种意见分歧一暴露之后，往下我就不记得我和这个“经济派”在任何原则问题上有过什么共同的意见了！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经济派”在组织任务方面也象在政治任务方面一样，总是从社会民主主义滑到工联主义上去。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而且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也一定要同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不一样。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自然，我在这里以及下文中都只是指专制的俄国而言）。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

—列宁《怎么办：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这种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也可以称为“密谋”组织，因为法文的“conspiracy”（“秘密活动”）一词相当于俄文的“密谋”，而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同这一条件相适应。因此，害怕别人责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建立密谋组织，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这种责备，也象说我们是“民意主义”的那种责备一样，是每个反对“经济主义”的人都应当引以为荣的。

—列宁《怎么办：“密谋”组织和“民主制”》

我们可以看到，对组织任务的狭隘见解之一，就是无法区分群众组织和革命家组织的区别。这样就必然会混同了群众工作和直接的革命组织工作，无法正确的处理这种区别自然就会造成组织的危机，使组织生命和一切组织工作都有被覆灭的风险。

一个高校的同志曾告诉我们，他们学校多年前曾经有过一些左派组织，他们发展一些和群众之间促进相互关系的工作，就如同现在未明子的“工益”所作的部分事情一样，当然他们不会像未明子一样打着不要暴力革命的路线和讲着歪曲马列毛主义的邪说。但由于他们的组织又同时在校园进行着左派思想的宣传工作，最后这些组织被集体消灭了，组织被学校取缔、成员被约谈，即使他们的全部活动都还处于合法的限度内。这里就是把群众工作和革命的宣传工作混同在一个组织里完成了，使这些活动同时的暴露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对警察来说这是很明显的目标，不得不使敌人把两者联系起来看待他们的目的。当然，这些同志还有其他方面关系的问题也没处理好的，如秘密与公开的关系等问题。

所以，对组织任务的狭隘见解之二，就是不能很好的处理秘密与公开的关系。群众工作中如工人组织的工作，这种组织是以工人职业为纽带的组织、是成员尽可能广泛、而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它要影响尽可能多的人而达到集体斗争胜利的目的；而革命家组织至少在俄国和今天法西斯制度下的中国就只能是严格的秘密组织了，它以革命活动为主要组织内容，它的成员要以革命工作为主要工作，它的成员选择是要严苛的，管理模式、发展模式、行动方法都是和群众的斗争性组织有所不同的。

并且，不管是从今天的情况来说还是从历史经验来说，这两种组织的发展方向也是不同的。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是领导无产阶级及广大农民为推翻反动统治，建立群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而斗争的政党。苏维埃是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是工农群众为解放自己与反动统治阶级拼死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两者各有不同的性质与作用，是绝对不能混同的”

—陈潭秋《党与苏维埃的关系》

革命家组织的发展方向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是革命的主观力量中又相对更主观的方面；而群众组织的发展方向则是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机关，它是革命主观力量中相对客观的方面。一个是革命主观力量的灵魂，一个是革命主观力量的肉体。两者是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两者的历史进程不同，但两者的结合和共同发展才能推动革命的发展，我们在前一期刊物中也谈到了这一点。

苏维埃诞生于1905年的苏联，乌拉尔的阿拉帕耶夫斯克工厂的工人首先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一开始作为领导罢工的机关。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维埃由领导罢工的机关转变为领导武装起义的机关。最后变为了革命政权的萌芽形式。苏维埃被沙皇专制政府取缔过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发展了出来。布尔什维克始终是苏维埃坚定的盟友，是苏维埃建立的倡导者，是帮助各地苏维埃建立与发展的坚实盟友。从苏维埃中也涌现出了许多先进的份子加入布尔什维克。“一切权利归苏维埃”是指让劳动群众们掌握一切权利。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第二期月刊《苏维埃、党和国家的关系》

群众力量的发展是战胜反动派的物质力量，而革命组织的发展则是组织起物质力量和赋予物质力量以革命性的主观力量。而今天，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意识形态（马列毛主义）不能或者说尚未结合的矛盾仍然在延续着，灵魂和肉体的相分离的矛盾对于我国革命份子来说还不可能通过同时发展两种组织而达到，因为这两种工作的性质是很不同的，就其分工来说，革命份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们只能分别完成这两种事情；并且就现状来说，两者已经发展出的力量都还很初级，其中革命的自觉组织还要更加初级一些，运动中的工人们不了解马列毛主义，而成熟的革命家组织更是还没有几个。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只能更通过发展出成熟的革命家组织去正确的结合我国群众们的斗争性组织才能够达到两者一并推动我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目的。

总之，对于我国今天的革命发展情况来说，一切都还是那么初级，发展和斗争中的混乱情况还有很多。我们将在下文更详细的讲述这两种组织，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

二. 革命的自觉组织

革命组织或者说更高级的革命家组织，是革命主观力量的两方面中又相对更主观的力量，它是革命的灵魂，它也是革命的自觉组织。所谓自觉，是和自发相对立的，因为一切自发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不可能自发的就产生革命的意识形态，它只能产生工联主义的经济斗争。

工人罢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说“自发因素”，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正是这种罢工运动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和自觉性也有不同。在7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90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因为工人已经不象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我不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斗争。90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明确的要求，事先考虑什么样的时机较为有利，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90年代的罢工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列宁《怎么办》

今天的我国开始发展的群众运动中也一再的体现出了这种斗争的经济性质。而自发性就是屈从于现有经济基础的产物。对于阶级斗争来说，自发性使人受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的限制，

从而把一切活动（包括斗争）也限制在了既有的资本主义旧秩序的范围内。群众们与经济上的不幸遭遇作斗争，但斗争的目的却不超过资本主义秩序的范围，比如要求偿还工资、加薪、减少工时、遵守劳动法等等，这些实际上也还不是革命的。

但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自觉性就是从这种自发性里提取出的更进一步政治性质，革命的自觉性是要求无产阶级去彻底解决与他相对立的阶级的统治地位，要求彻底的推翻整个旧制度的自觉，并且自觉的、有计划的进行各类活动以达到以上的目的。

可见，自觉性产生于自发性又与自发性相矛盾。如果说工人或其他职业的群众组织的斗争和活动还是自发性的组织的话，那么革命组织与他相比就是自觉性的组织了，这种组织一开始就要确立了革命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目的，并以此为行动的指南去活动。一种以自发性为主，一种以自觉性为主。自发性与自觉性便是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的一大区别。

但这种自觉性的要求又要一定条件的革命份子才能够达到，这些革命份子自然是从学生或工人中出现的。他们的任务明显要不同于一般群众，他们一开始就要把实现社会主义当作了最大的目的，这是这种组织的最重要特征，也是和一般群众组织的区别。当然革命组织和革命家组织，以及这些组织之间也会有复杂的区别。

三. 革命自觉组织的发展

虽然这种革命自觉组织是不同于群众组织的，但这种革命组织的产生，特别是它的最初阶段又是必要借助旧的社会关系的，它需要在旧的社会关系中，在一般群众中挖掘出先进份子来构成新的革命关系，并以此为基础不断的发展革命组织。而先锋队就是这种革命组织发展方向的最终阶段。

1. 融入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发展革命事业的过程，宛如织一张网，联系和发展着各种各样旧社会关系中的共产主义的线索。
2. 资本主义社会不会直接存在革命关系，它只是造成了产生革命关系的条件。革命的关系只能从旧的社会关系中改造并产生出来，把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线索充足的联系起来，编织成一张独立于旧社会关系的网，也就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革命组织。
3. 先锋队只能在这样一张又一张在广度上不断发展，在纵度上不断增加的织网过程中产生。但先锋队和其他一切程度的革命组织都离不开下面的网支撑着它。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第一期月刊《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以及我们目前的过渡阶段》

但这决不意味着要把群众组织工作和革命组织工作的许多地方混同起来同等对待。一方面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发展革命组织不得不作一定的群众工作，一方面又有所不同、有所区别，因为这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足够危险的事情。谁都知道我们联系和发展群众中的共产主义线索，是为了建立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而不是要把这种革命组织当作一个可以公开展示成果给其他无关的人看。并且这种联系和发展群众中共产主义线索的过程也得是不引起警察

的关注的活动，更不要说这个产生出来的革命组织的工作又要不同于和不局限于群众组织和群众工作的，更要区别对待。秘密性是革命组织的能够在我国目前的法西斯专制环境下能够安全存在和继续发展的主要条件。

我国左派组织过去很大一段时间内直到现在，绝大多数的组织都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这些组织中，有线上也有线下的组织，这些组织基本上都把这两种工作混同了起来，革命份子的组织、调查以及学习培养工作和宣传引导群众和筛选出先进份子的工作混同了起来，并且很多时候基本是在同一个社交群体内完成的，我国基本有很多这种线上组织，他们以国内合法平台的聊天群的形式发展，发展群员、进行宣传并从中发展出新的左翼分子。事实上他们也是一种从自发性到自觉性过渡的阶段，同时具有着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的特征，不限制其成员是为了最大程度扩张和影响群众，而开始限制成员则只能是为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和集中先进份子，但这种组织基本上做不到贯彻任何一方面，当然这仅仅只是这种组织的一部分问题而已。这种组织自然有其历史意义，它造产生了一批初级的左翼，给了许多受影响者提供了一个初级的台阶，让他们能够从此吸取最初级的革命素养。但它也具备着各种致命的缺点，这些缺点则使它完全无法胜任更进一步的革命任务。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想要批评这种模式一点用处都没有，事实上他们也培养了一些马列毛主义者或者倾向与马列毛主义的新力量出来，这些份子如果他们能幸存下来的话自然有机会更进一步。但这种发展模式的组织注定了他们会全部的暴露在敌人的监视之下，甚至就连这种在我们看来很无害的聊天群警察也都要分配警力来关注并安插卧底。是的，我们得知很多起警察约见这种线上的（无论墙内外平台）的群聊组织的普通群成员并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收买来发展特务进行调查、渗透的情况，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被一些人所熟知的组织有这种活动外（这种组织一般有很多个群，几个到二三十个不等，有几千人上万人的群员），甚至还有一些在我们看来规模特别小的群（不到一百人）警方有时也会采取这种行动。他们最后往往会把这些组织摸得一干二净。一般是等到了一定的时机，或者这些组织要进一步的做什么活动就把他们剿灭，并且警察很多时候都会留下少数几个幸存者“养寇自重”，进行“繁殖”，等他们再次发展起来的时候再把他们消灭并重复以上的行动，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在已经被他们打击过了的前左派组织的份子中试图发展新的特务出来。这些墙内左派组织的平均寿命往往只有三四个月，这一点时间的确很难进一步积累革命素养和发展更高级的工作。

即使是线下的左派组织，在他们采取半公开或公开的方法进行活动并作以上工作的时候，总是能很快的被注意到，并使得自己上了警察的重点关注名单，有的时候甚至会通知学校或者这些份子的工作单位对其进行监视。警察则会关键时刻给予打击，但这种关键时刻不完全是这些地方公安部门自己决定的，有的时候接收到上级的政治指示或有新的政治变动的时候也会采取集中的打击行为。去年的3月到5月间，由于一些盲动组织和恐怖主义倾向的份子在许多墙内外左派组织里大肆传播炸弹制造和武器制造知识，引起了一波全国范围内警察对各地左翼组织成员的打击，而去年二十大之前又进行了一次力度更狠的集体打击。

因为不区分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因为不注意秘密性和安全问题导致被消灭。然后又一次复一次的被消灭。当老的活动家被消灭后，新一代活动份子与其毫无联系，或者并没有继承其之前的经验，在和他们的先辈以前那般同样不成熟的情况下继续去重蹈覆辙。如果我国革命份子无法克服这种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环境给我们的考验，无法掌握在这种严苛环境下继续

发展革命组织和革命工作的方法，那么革命则还是遥不可及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种现象和历史上俄国革命运动早期阶段时所面临的情况也同样有部分相似之处值得我们参考。

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这个小组逐步地开展了愈来愈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博得了有教养社会的一部分人的同情，他们捐出一些金钱，并且把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交给“委员会”支配。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那些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过话和解决过“往何处去？”的问题的人，那些同工人建立并保持联系和印发过传单的人，现在已在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游行示威，最后转向公开的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张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游行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虑好的和逐步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結果，而只是按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是因为警察局自然差不多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初露头角”的主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对它最合适的时机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以便获得明显的犯罪构成，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留下来“繁殖”（据我所知，我们的人和宪兵都使用这个术语）。我们不能不把这种战争比作一群农民操起木棒去进攻现代的军队。

—列宁《怎么办》

可见，继承性是继秘密性后又一个需要革命组织做到的因素。

但和列宁写《怎么办》的时候相比，显然我们革命阶段还要更早期一些。那种同工人建立联系并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和鼓动并以此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和一些人的捐款的情况在我国还是完全没有的。但反过来的情况还是有的，如未明子号召学生做工益活动拿父母的钱给其他工人捐款并提前给工人打预防针，号召工人放弃暴力革命的情况还是有的。

四. 我国革命组织的必要性质

最后，我们打算总结一下这种革命组织需要具备的性质。这里我们打算在引用一下历史上的经验。

在组织方面，正如我已经屡次讲过的那样，“聪明人”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至于他们是从学生中还是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反正都一样。因此我认为：

- （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
- （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
- （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
- （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

难被“捕捉”；

(5) 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

—列宁《怎么办》

结合前文，除了一开始就要区分和定位清楚的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的区别。我们还要这样总结出对于我国目前的环境来说，革命组织必要具备的一些特征：

1. 具有革命的政治路线（马列毛主义），也就是革命的自觉性，它是保证革命组织性质的首要特征。
2. 要具备足够的秘密性，这是保证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能够安全的特征。
3. 保证革命组织继承性，这是保障革命运动能够继续发展的特征。

五. 群众的自发组织

关于群众的自发组织和自发运动，在这一点上我国群众们已经领先我们一截了，当然这一截领先得还不算特别远。群众集体的经济斗争和自发活动在我国已经开始比较频繁的出现，但自发产生的用作于斗争的群众性组织还是很稀缺的东西。带头去成立这种斗争性群众组织的群众领袖也很快就被消灭，陈国江案便是一个例子。

陈国江作为一名外卖骑手，他发起微信群“外卖骑手交流群”，起初为外卖骑手交流互助为主，后来开始组织“骑士联盟”，自称“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截至2020年6月，共发起11个骑士联盟群，好友人数超过14000人。他因为利用空闲时间帮助外卖员维权，调解纠纷，被骑手们称为“盟主”。2019年10月，陈国江因发动外卖员拒接外卖订单来为骑手们维权，被我国警察拘留了26天。2021年，陈国江在网上曝光“饿了么”平台对外卖员春节期间奖励有欺骗嫌疑。2021年2月25日，陈国江被北京警方带走，原因不详，同时也有相关多人被警方带走。3月17日，其家人收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发出的刑事拘留通知书，称陈国江涉嫌“寻衅滋事罪”已于2月26日被拘留，羁押于朝阳区看守所。而2021年4月2日，陈国江的亲属收到了他被正式逮捕的通知书。

但此事在今年又有了些变化。

因组织工会性质的外卖人员“骑士联盟”而遭北京警方拘捕的陈国江，近日传出重新露面的消息。但有专家认为，陈国江身后的中国劳资关系问题依然困难重重。

在再次露面的视频中，被称为“骑士联盟”盟主的陈国江外貌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

34秒的视频，多数时间是陈国江在冬日的阳光下行走的背影，只有几秒钟是他转过头来挥手致意。他似乎在说些什么，但被背景音乐淹没。背景上配着几个简单的短句：“我还好，你还好？”以及“各位兄弟，后会有期，江湖再见”的字句。

香港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1月3日在推特上转发了这则视频，称这是陈国江在自己的微信影音号上发布的。

目前本台记者还没有从其他渠道完全证实陈国江获释的消息。一位长期关注中国劳工运动的赵先生告诉本台，左翼工运圈子里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是，陈国江应该是有了部分的人身自由，但不能确定是取保候审还是无罪释放。

但陈国江重新露面的消息，已经让他过去的“各位兄弟”兴奋起来。“骑士联盟”以“工号51”为名的一个社交媒体群中，群主喊话道“不论统治阶级的打压有多么险恶，51都将同盟主、同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一起斗争下去！”

在群主的眼中，陈国江被警方关押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打压”。但对陈国江的这种打压，并没有让他身后的中国外卖骑手群体觉得，他们当初诉求的公平劳动待遇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记者：王允 《自由亚洲电台》

我国群众面临的劳动环境不比我国革命者们要好多少。我国法西斯专制把合法活动限定在极小的范围内，实际上根本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群众自发的职业组织或革命组织出现。所以这种情况也导致了政党组织、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职业组织的区别在我国不那么容易被分清。而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中，这一点一般是很难混淆的（因为这些组织大多能都合法的注册和发展）。

也正是由于我国的法西斯统治，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影响，必然导致我国劳动者更倾向于彻底的解放和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也只有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才会支持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明子等机会主义活动的破产在未来则完全是必然的事情。

历史上的苏维埃就诞生于俄国工人与沙皇政府的斗争之中，从一个领导劳动者们进行经济斗争的机关，随着革命的发展变成了领导更多群众们进行起义的机关，在革命成功后最终演化为了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自己的政权机关。

仅仅只是从陈国江骑手的示例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我国的职业组织很多时候从诞生一开始的早期阶段就不得不成为领导群众们进行经济斗争的机关，因为在其他时候，一切群众自发的职业组织不能存在的情况下，群众们在经济斗争中必然需要制造出这种用于斗争的职业组织。并且在斗争的运动过程中很快的就能产生出更高的政治倾向。

职业组织只是群众组织的一种。不仅仅只是职业组织，有时候往往是相同境遇受害者们也能自发的组成类似的用于斗争群众性组织。如直至今天都还在坚持维权的部分河南村镇银行的受害储户们，他们被我国银行流氓般的夺走了积蓄并被镇压。这些受害者采取合法手段维权也都会被打击，以至于在两会期间还要被当地警方绑架、殴打、非法拘禁。为阻止其上访，被绑到了上海崇明区的董海平便是这样的例子。

本人董海平，身份证号：xxxxxxx 家庭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新北新村

本人于2023年3月4日早上6:50左右，出发前往宁波协助侄子购车。我爱人和我爱人的侄儿同行。在本人出发时，有6人拦车阻止，强行打开后车门，把我爱人拉下车。之前和他们这些人有过略微的交流，大概了解到是受新场镇政府安排，对我进行监视居住，因为我是安徽河南村镇银行储户，为了阻止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这些人员从未出示过相关的工作证明。

我曾经告知过他们，两会期间不会上访，且在事发前一天就提前与他们沟通，告知3月4日去宁波购车事宜。

被强行阻拦时，本人拨打110报警电话。民警带双方到新场镇派出所进行调解。在到达新场镇派出所后，民警让我们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双方当事人的名字、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随后让我们坐着等待，期间我曾去过派出所院外的公共厕所，民警让辅警跟着我，但是对方却能自由出入。

大约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民警让我到窗口做了笔录，笔录完成后，民警让我和我爱人离开派出所，继续对我爱人的侄子进行问讯。本人表示要在派出所内等待，遭到拒绝。

就在本人刚走出派出所院子的时候，拦截人员强行将我们塞进他们开来的两辆汽车内（号牌分别为皖A7CZ66黑色大众SUV、沪C COM3T8白色大众轿车），当对方4人将我抬进皖A7CZ66车内的过程中，本人拼命挣扎，并对着派出所门口的门卫保安和民警大声呼喊求救，但那些保安和民警却未做出任何反应。

本人被对方强行按进对方的车内后排，两人把我夹在中间，将我的双手用力扭住，用黑色头套把我的头套住，把我身上的钱包、身份证、银行卡、手机等所有物品全部搜走，本人未挣扎和反抗，但他们却始终把我的两条手臂扭得死死的，导致我的手臂非常的疼痛。

两小时后，本人和爱人被带到了崇明区建设镇虹桥村333号顾伯伯乡村民宿（6号晚上被转移到虹桥村1121号吴海兵民宿），期间完全限制人身自由，所有私人物品均被搜走。

期间在我完全配合他们的要求的情况下，仍遭到两次殴打，各种恐吓和威胁，并扬言政府部门公安机关都是他们的人，不管我们作任何事都是徒劳，只要不把我打死，他们就可以逍遥法外。

3月14日早6:30，本人想尽办法成功报警，出警民警的警号是060076，名字叫顾清，在了解情况后告知本人并非绑架及非法拘禁，随后民警即离开，出警过程中，民警执法记录仪并未开启。当天一天未给本人提供食物。晚7:00左右，给我带上黑色头套，故意将我放到离住处较远的地方才恢复自由。

针对以上遭遇本人提出诉求如下：

- 1、查明跟踪、绑架、拘禁、殴打本人的相关人员身份，并且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 2、保障本人合理合法上访的权利。202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信访工作条例》，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问题，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干扰和阻碍群众正常信访行为，一旦发现，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 3、追究相应民警责任。本人在人身自由被限制、被殴打之后曾多次报警，相应处警民警均未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接处警工作规范进行处置。

但是我们还没有查到这件事后续，显然我国政府还了无回应。

总的来说，对于这种群众们组织的维权组织，不管它是职业工人组织或者职业的外卖骑手组织还是受害者们的组织，也都会面临法西斯专制的打击，也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性质来和敌人对抗。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这是对的。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但是，参加组织的成员广泛，也就不可能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所需要的训练，要比参加经济斗争所需要的多得多）。怎样才能解决既要成员广泛又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呢？怎样才能使行业组织尽量少带秘密性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使行业工会合法化（在某些国家里，先有行业工会的合法化，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合法化），或者是使组织仍旧处于秘密状态，但同时又必须使它非常“自由”，形式不固定，象德国人说的那样是松散的，使秘密性对于广大会员几乎等于零。

—列宁《怎么办》

列宁指出了两种方法。但就我们今天的具体情况而言，在专制国家追求合法化的群众维权组织是更困难的，而秘密的群众组织则成为了必要。使它在平时对于其他人来说是秘密的，但形式又不固定，使这种秘密性对于参加的成员来说几乎等于零。这种组织在经济斗争时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本来还可以拿章程作为例子继续进行分析，但是我认为讲得已经够了。一个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这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固定的形式也能充分执行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一切职能，并且执行得正象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那样。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运动不顾一切宪兵的破坏而得到巩固和发展。

有人会反驳我说：一个组织这样松散，根本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甚至连固定的、经过登记的成员都没有，根本就不配称为组织。也许是这样。我不追求名称。但这种“没有成员的组织”能够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并且一开始就能够保证我们未来的工联同社会主义发生牢固的联系。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

道理很简单：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从建立那种好像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两种目的都实现不了，就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祖巴托夫式或奥泽罗夫式的工联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

—列宁《怎么办》

列宁的方法具体说来很简单，要使陈国江这样有群众影响力的和能够代表其他劳动者的人处于秘密的状态来和革命组织发生联系，也要使自己完全不被警察关注。只要这类核心份子能得到群众最广泛的支持，这种“骑士联盟”就不应该具备固定的形式，如不固定于微信群等手段进行交流等，甚至可以不固定于线上交流。这种组织就能够完成我们想要达到的一切，并能最好的和敌人作战以及保护自己的力量。

可靠的核心份子保持秘密性、秘密的和革命家组织产生联系、得到群众的最广泛支持、不具备固定的形式，这些就是我国合格的用作斗争性质的群众组织所需要具备的特征。

六. 自觉组织和自发组织的相互关系

我们在群众组织的方面谈了一些。但话又说回来，我国的大多数革命组织的活动相比群众组织的活动明显更加初级。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革命组织极其稀少，对劳动者来说还做不到有多大意义的帮助，另一方面我国的左派组织目前还太初级，绝大多数连自保都尚且做不到，更难说给予劳动者们的帮助了，这种自觉性只是相对于群众组织而言的，大多数还停留在左派组织的程度上，离职业革命家组织更是相距甚远。当然，我国斗争性的群众组织目前也很难做到自保。

但就其关系而说，使革命组织首先做到自保并发展到一定的能够帮助到对方的阶段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的。至少对于我国自觉的革命者来说，既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就要着手去解决，况且现成的历史经验、材料是我们不应该放过去利用的。

波一夫在《工人事业》第6期上写道：

“如果说，逐渐向更广泛的实际行动的过渡，即直接由俄国工人运动现在所处的总的过渡时期所决定的过渡是一个特点……那么在俄国工人革命这一总的机器中还有另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特点。我们所说的就是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普遍缺少能够进行活动的革命力量。由于工人运动普遍活跃，由于工人群众普遍进步，由于罢工事件日益频繁，由于工人的斗争日益采取公开的群众性的形式而使政府加紧采取迫害、逮捕、流放和驱逐的手段，于是这种缺少优秀的革命力量的情形就愈来愈明显，而且无疑也不能不影响到运动的深度和一般性质。许多罢工都没有受到革命组织有力而直接的影响……鼓动传单和秘密书刊都感不足……工人小组没有鼓动员……与此同时，经费也常感短缺。总而言之，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现有的革命家人数太少，不能对所有骚动的工人群众都施加影响，不能使所有的骚动多少带一点严密性和组织性……单个的小组、单个的革命家没有集合起来，没有统一起来，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纪律的、各部分都有计划地发展的组织……”接着作者说明，旧的小组一遭到破坏马上有新的小组产生出来的事实“只是证明运动富有生命力……而并不是说明已经有足够的完全合格的革命活动家”，然后作者得出结论说：“彼得堡的革命家缺乏实际修养，也反映在他们的工作结果方面。最近的审判案，特别是‘自我解放社’和‘劳工反资本斗争社’审判案清楚地表明：青年鼓动员不大熟悉本工厂的劳动条件以及进行鼓动的条件，不知道秘密工作的原则，而只是领会了（领会了吗？）社会民主党的一般观点，所以只能做四五个月或者五六个月的工作，接着就被捕，而他的被捕往往使整个组织或至少是一部分组织遭到破坏。既然一个团体只能存在几个月，试问它的活动能有成就和效果吗？显然，现有各组织的缺点不能完全归咎于过渡时期……显然，现有组织的成员的数量，主要是质量在这方

面起着不小的作用，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严格挑选成员的条件下把各个组织切实地统一起来。”

—列宁《怎么办：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仅从当年俄国活动家的对革命刊物的反映来参考我们今天情况，我们也不会比当时俄国好。俄国这些组织由于其早期的不成熟往往只能存在四五个月或五六个月，我国的革命组织甚至更为短命，在一切线上线下的左派组织中（他们甚至还不算革命组织因为他们定位不明，把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两方面的特征都混杂在了一起）能存活超过一年的便是特别长寿的了，一切有活动经验或者打听到足够多的消息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些组织的短命，往往两三个月就已经会被警察换了很大一波组织了。总而言之，我国的工人运动走在了我国革命组织的前面。事实上，我们的工人更是什么帮助都没有，不仅缺乏优秀的革命力量来领导运动，也缺乏宣传和鼓动的材料、供于学习的秘密书刊，也更不可能有鼓动员。我国革命份子的缺乏修养更是普遍的情况，甚至有许多人对于反动派可能打击更是抱有天真般的无所谓态度，从而继续自发的搞定位不明的左派组织，而一旦被打击后又容易垂头丧气放弃了事业。大家对于斗争的经验都还远远不足，特别是保护活动家安危的经验、技术以及和警察斗争的技巧更是缺乏，这个问题已经不断地在使我们失去群众组织中和革命组织中的各类活动家了。但这些问题不是不能够解决的，任何革命份子和进步群众都应该努力的掌握这些用于斗争和组织知识，并把他分享给更多的同志或群众。

群众需要我们去传授他们斗争的经验和技巧来使他们斗争胜利，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构成更大的团结来争取更多，需要我们为他们带去社会主义的理论使他们认识到如何真正的解放自己。而我们也需要群众们的庇护。我国群众和我国革命份子的关系毫无疑问是相互依存的坚定的盟友，彼此都以各自的最大、最根本利益谋划。我国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发展自然会使秘密的革命组织和革命份子更加安全，而我国革命组织的发展和革命份子的成熟又能带动我国群众最大范围的团结斗争和进一步的迈向革命。

七. 我们当下的任务

对于我们革命份子来说，我们首要任务或者说主要方向是为了建立一种革命家组织，这种革命家组织的最完全形式就是一个革命党。这种组织要利用起一切的革命活动和群众工作发展自己，让自己再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使自己能够从一个左派组织往革命组织过渡，再从革命组织往革命家组织过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各类组织都是不够的，但不够更是的革命组织和革命家组织。

在法西斯专制还空前巩固的我国，任何向群众广泛宣传的活动，一旦超出一定的界限就会被彻底打击。为了不至于被消灭不得不使这种面向广泛群众的宣传活动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可是这样限制下的活动自然不能担负起使群众走向革命轨道的使命。

但这种一定范围内的活动却又有可能寻找到成熟的先进份子或挖掘引导出半先进份子（因为这些人多少是接受和认可了一些马列毛的理论的或持有一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就难度来说，利用合法的安全范围内的工具（或是秘密的利用非法的工具）花较小的力气而不容易

引起注意的方法来挖掘既有力量，来进而发展秘密的、自觉的革命家组织，要比利用这些工具费更大力气和造成更大声势的来从一般群众中发展出力量容易得多。就从安全性上来讲也是相差甚远的。

要肩负起带领群众走向革命的使命就必然需要对群众做更广泛的和更深刻的宣传、鼓动和揭露工作，并还要建立起群众对我们的信任。这种活动必然是非法的内容，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水平、革命立场和斗争经验以及成熟的革命组织则是无法胜任这样的使命。

对于一般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来说自然应该选择建立职业组织，对于大多数还是学生活动者来说就没有那么去做的条件。而对于革命份子（包含学生和劳动者）来说，目前都更应该是优先建立一种革命组织，为更长远的事业考虑，并且这种力量目前更为稀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自发组织是要包含绝大多数群众的组织，他们觉醒和发展是实现革命的重要力量，但我们如今的势单力薄的力量很难去发展这样的组织的。而另外一方面，自觉组织是较少的革命份子和先进份子的组织，他们也是实现革命的重要力量，没有自觉组织先进的理论指引和帮助自发的组织就难以以革命的路线前进和成熟的和敌人作战，而发展这种组织在目前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用成熟的革命组织的力量帮助发展群众组织是可能的，而反过来则更为困难。

更具体的来说。对于革命份子，应该优先发展革命的自觉组织、秘密的组织、有继承性的组织、能从群众中挖掘出力量的组织，能与群众组织很好的结合的组织。只有很好的完成了这些工作，我们将来才能往下一个阶段发展而进行更多的宣传和群众工作。而要实现这样的目的，目前也只能更多的先依靠先进份子，所以重点应该是集中自己所掌握的共产主义的线索，尽力的寻找已有的先进分子，其次是组织和发展半先进的份子，其次再是发展有一定倾向性的群众。

而对于劳动群众们，应该建立起于其他同事们的广泛的信任，形成广泛的、秘密的、但不具备固定形式的用作斗争的职业组织，这是一种群众组织。但也要形成可靠的、秘密的稳固核心，并和革命分子们建立秘密的联系。

我们今天离革命的距离和革命组织工具

RSF 编辑部

一. 革命家组织和反动的改良主义组织

在谈论我们今天的革命份子和“左派”极其组织、活动距离我国工人还有多远前，我们就有必要谈谈他们目前是怎么活动以及他们的组织是什么样的了。对于我们而言，我国目前的所有此类份子组成的组织都还不能称其为革命家组织，比较历史上的哪怕是还没有政党运动前的早期革命组织而言也还是相差甚远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只能称其为“左派组织”。也许已经有了极少数组织多少有了自觉性，开始自觉的往某种程度的革命组织发展了，但这也还是极少数情况。

正式的革命家组织，自然是以革命为第一目组织目的的组织；并且他的成员是以革命为个人职业，靠无产阶级或者其他需要革命的群体的经费活着的组织，以今天我国的现状来看这种组织只能是秘密存在的。但很可惜这种组织严格来说在我国还是不存在的（只有极少数的，国际组织来我国活动的小分部、以及其纲领完全不是革命的其他职业活动的组织）。

有人也许要说，未明子的工益组织不也是靠需要革命的团体的经费活着的组织并且要以实现革命为第一目的的组织吗？那可真是天大的误解了，对于他们组织的性质我们打算先引入一段列宁的论述。

“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不中用，因为它不稳定”，——完全正确。但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至于能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是学生还是工人，这都一样。而你们作出的结论，却是说不应当从旁推动工人运动！你们由于政治上幼稚，竟不知道你们的这种主张只是有利于我们的“经济派”和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请问，我们的学生“推动”我们的工人，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唯一的表现就是，学生把他们所具有的一些零星的政治知识和他们所获得的片断的社会主义观念（因为目前学生的主要精神食粮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而合法马克思主义只能提供一些起码知识和片断）传授给工人。在我们的运动中，这样的“从旁推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少得出奇，少得可怜，因为我们已经过分地热衷于闭关自守，过分奴隶般地崇拜那种初步的“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的经济斗争”了。我们职业革命家应当而且一定会百倍努力地来从事这样的“推动”。但正因为你们选用了“从旁推动”这样可恶的字眼，就必然会使工人（至少是那些象你们一样不开展的工人）不信任一切从旁给他们提供政治知识和革命经验的人，使他们对所有这些人都本能地表示抗拒，——这样，你们就成了蛊惑家，而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

—列宁《怎么办》

今天的未明子和列宁所论述的一类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蛊惑家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他们一边要蛊惑工人们小心一切可能的革命分子和革命组织对群众进行这种“从旁推动”，而要进行他们的、反动版本的对工人阶级的“从旁推动”。

首先，事实上未明子号召的此类组织是反对暴力革命的，是以追求改良达到所谓的社会主义目的的组织，所以他们甚至是不如列宁所批判的“过分奴隶般地崇拜那种初步的‘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的经济斗争’”，毕竟我们都知道未明子要“大三权”不要“小三权”而否定经济斗争，要改良和合法的捍卫社会主义而不要任何历史上“教条”的阶级斗争了而否定用革命性的活动或思想来影响工人。

这种行为和目的本质上就是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不以暴力砸碎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专政则是不可能使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以放弃暴力革命为前提条件号召工人和学生用改良来达到目的，本质上是欺骗工人和学生去做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用小恩小惠使人放弃实质上的自我解放、逃避斗争，这种活动本质上只能对少数改良主义领袖有益，所以究其性质而言他们首先是反动的号召群众放弃革命的改良主义组织，是灌输反动思想以维护我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组织；第二，此类组织的活动者许多是兼职学生其次是一些有闲工夫的第三产业工作者或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有自己的职业（如学生、教师、自媒体工作者等等），他们没有条件做到也不可能做到以放弃生计或放弃学业为代价来从事这种活动，所以究竟成员职业性而言他们还是一个兼职组织；第三，组织经济来源不稳定、不正常，大部分这类组织的经费还是靠学生成员抽出自己的生活费为主、一些靠小资产阶级成员或其他第三产业工作者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组成，就其经济性质而言他们也不会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其组织活动自然要屈从于这类阶级或群体的政治利益，拿谁的钱就为谁服务，他们连这一点也弄不明白，毕竟他们一开始就排除了无产阶级经济支持，因为他们认为收工人阶级的钱是投机主义的行为，所以他们也不可能为真正的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只能是以小资产阶级和自己群体的狭隘利益去歪曲这一点，所以他们自己所批判的“机会主义”在我们看来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他们在针对背叛小资产阶级和保守派、改良派利益的行为的批判。

二. 革命家组织、革命组织、左派组织

对未明子旗下的工益组织的评判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再说说其他左派组织，但很可悲的一点是，大部分其他左派组织在实践上还不能赶超未明子工益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未明子的工益组织多少能接触到一些线下的劳动者了，而其他的左派组织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很少。如果其他革命份子不能做好自己的组织活动并建立起一个更革命也更能服务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实际上也是在被动的把工人往改良的方向上推，使工人不得不更受这种组织影响，这也就不得不使我国群众必要经过一个大弯路和大教训才能彻底识清他们的真面目（如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活动中或国家危机时的站在反革命改良主义的镇压立场上，当然未明子已经多次站在镇压工人的立场上了，如污蔑富士康工人运动中的工人们是受黑中介工团主义操控的运动，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有实力操控工人，往往是连中介收到的钱也不够给工人发了，更不用说我们国家目前低级的政治组织更做不到直接组织或影响工人运动这一点，这完全是一场工人自发运动，工人们不通过斗争就拿不到钱）。

而我国的其他多少带有政治目的组织，只能做到报道、揭露、宣传、鼓动这种已经发生的工人运动的程度，并且这种工作目前做的影响也还很小，社会大部分群体还没有受到足够影响的，富士康工人运动、重庆药厂罢工这两起在左翼圈子里好像都得知的情况（其实他们大多

数也不知道细节），其他群体还根本不知，并且他们也只能关注到这种较大的事情，而较小的就很难知道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不仅是因为我国左派组织规模小、分工不发达，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左派组织依然是不干正事的，连报道、揭露、宣传、鼓动也都是缺乏的，他们对此类运动的关心还停留在打听一下影响力比较大的事件的轮廓当作圈内谈资上，也就是说在政治上他们还是落后的、也是不够敏锐的，自发性还在严重的束缚他们进一步去了解阶级斗争和做更进一步的报道、揭露、宣传、鼓动活动。

非职业性、没有经费注定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组织，但他们也算不上某种程度的革命组织，只能是某种程度的左派组织。是因为其成员往往还没有克服反动思想的干扰、还受自发性的束缚，其组织往往没有统一的、正确的并受成员认可愿意执行的革命的政治纲领（这种纲领自然可以不公布出来给警察们看），连一个明确的共识、革命目的和私下进行统一以上范畴的活动也是缺乏的。如果能有一个正确的革命纲领或革命路线并以其规定的革命目的的革命活动为组织唯一目的的，就算其成员还是兼职的也还没有经费也能算某种程度的革命组织了。

可见我国的左派组织之所以我们要叫他们为左派组织而不是某种革命组织，其最大区别就在于组织没有统一的革命纲领、革命路线，其组织目的和活动也是自发、零碎缺乏计划的，更不是纯粹为了革命的。但我们所说的这种革命组织显然和历史上的革命家组织还有较大的差距的，至于历史上的革命家组织和我们所说的革命组织的区别，我们可以先看看列宁是如何论述革命家组织和职业革命家的。

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

—列宁《怎么办》

他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经验和技能，他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自己的知识，他亲眼看见其他地方和其他政党的卓越的政治领袖，他自己也力求提高到同这些领袖一样的水平，力求做到既了解工人群众，又具备新鲜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时也具有无产阶级在同训练有素的大批敌人作顽强斗争时不能没有的专业技能。倍倍尔和奥尔一类的人就是这样并且也只是这样从工人群众中选拔出来的。但是，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多半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却应当由我们的组织来有步骤地进行。凡是有些才干和“有希望的”工人鼓动员，都不应当在工厂内做 11 个小时的工。我们应当设法使他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时地转入秘密状态，使他随时更换自己的活动地点，否则他就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不能扩大自己的眼界，不能同宪兵至少周旋几年之久。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广愈深，他们所能提拔出来的有才干的人也就愈多，不仅有有才干的鼓动员，而且有有才干的组织员、宣传员以及褒义的“实际工作者”（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在我们那些多半带有一点俄国式的懒散和呆板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支队伍，因为这支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无限信任。我们真正的过错，就是我们很少“推动”工人走上与“知识分子”共同的、学习革命专业技能的道路，却经常用工人群众和“中等工人”“能够胜任”什么的愚蠢议论来把工人拉向后退。

—列宁《怎么办》

而革命家组织则主要是在成员的职业性上、专业性上和组织活动的广泛性、深刻性上与革命组织拉开距离了。革命组织也可以看作是一般组织往革命家组织的过渡，当然它本身在今天的我国也有重要的独立意义，他们已经可以胜任许多重要的革命工作了。至于革命家组织，则需要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并且是很不广泛且秘密的组织，在专制国家特别是我们这样的法西斯专制国家还需要这样的份子专门靠党的经费来活动（今天也可以说成靠工人阶级给的经费活动），受到了专门的训练且无限的忠于革命，使它脱离工厂能够做一切秘密的、危险的但是工人阶级所必要的工作，并有能力和警察做斗争且很好的保护组织和自己。当然我国革命组织多少也有一部分这些特征了，需要把很多活动秘密化，选择成员需要条件，需要一定斗争知识和政治理论，在本职工作之余的最重要活动便是此类组织的活动。

三. 我国的左派组织

谈论几种组织的区别，我们再来谈谈我国的左派组织。当然抛开了政治上的区别，我们主要是从组织类型和活动范围区分。有一些“左派”把这种区别当作了政治区别，并互相攻击对方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等等，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思想，这只会促进分裂而不是联合，给敌人各个打击的机会，这是由于他们还不能够深刻的理解革命是需要绝大多数人参与、需要各种各样的工作、以及阶级斗争也是复杂多样的事实。我们号召这部分人要立即放弃自己狭隘幼稚的观点，要从更广泛和深刻的视角来理解政治需求和组织活动两个问题。

话说回来，首先我国左派可以分为线下和线上两个大的组织类别，当然有的组织也有两类都在搞的，但总是有主次之分的。其次我们先谈线上组织，线上组织又可以分为墙内和墙外两个类别。我们先墙内的组织。

线上的墙内组织是我国左派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没有数据统计，实际上我们现在也不可能做到数据统计，但只要这是线上、线下、墙内、墙外几个方面都有所了解或者都参与过的活动者，自然能够得出和我们一样的经验判断。

线上墙内组织中的大部分组织是定位不明的，是分不清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区别，也分不清左派组织和革命组织的区别，从成员到活动范围来也都是如此，所以始终无法把自觉性抬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上，其作用就在与能使一些有闲时的多少关注一点政治的群众能够有机会了解到一些入门的“左翼”知识（但这个左翼的内容就不能保证其性质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组织还是有作用的，但自然是难以承担更重大的使命的。但即使是这样，线上墙内组织也不是个个都能做到这一点，也有一些理论混散、立场不坚定的份子也在把控着这类组织高地的现象，灌输反动的知识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理论给群众，对于这种份子或组织应该要和他们做坚定的理论斗争，在合法的范围内是完全可以做这种理论斗争的；当然这是为尽可能培养一些掌握社会主义知识的群众的目的所服务的，也要注意无意义的宗派主义作风，在少部分左倾或右倾的团体那，往往得罪的人比教育的人要多得多，大部分群众是中间派，坚持给其他人灌输反动思想始终是少数，只要揭露了并且使大家认清且抛弃了这少数份子就行了。

所以这类组织也应该要明确的梳理起真正革命理论的地位，往革命组织过渡，要确保马列毛主义在群众心中的地位。

墙外组织则中，革命组织的比例就大大增加了。普遍具有明显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的，组织纪律性上也更明显，马列毛主义组织具有重要的地位。虽然这些组织加起来的总体规模和数量肯定是远远不如墙内组织的，但此类组织加上其外围组织能影响的个体也是要远远大于墙内组织的平均规模的，少数组织是能做到几十人的核心影响上万规模的外围组织成员的。但此类组织中的大多数依然是以聊天群为主要组织工作的，也许其中部分有了往更深刻的革命活动过渡的特征比如准备融工、调研等，但其往往因为在墙外的公开活动和广泛的群里组织工作的影响使其秘密活动必然要变成不秘密的了，也就是说其组织和重要组织成员早已暴露在警察的视野里了，他们在广泛的群聊组织或其它类似工作中建立了数不清的广泛的关系的信息链条，对于警察来说这也是用来抓捕活动者的链条，其更进一步的革命活动或其他秘密活动自然也更难做到秘密了。

墙外是相对墙内的更秘密的线上渠道，我们应该是利用其秘密性来发展秘密的组织和秘密的工作使警察没有头绪而尽可能减少其线索的，广泛性的、公开或半公开性的工作（如群聊组织）则应该是由墙内主要完成。而不是在墙外发展和墙内一样的公开、半公开的或广泛的工作给警察增加线索的，否则这种组织就会失去了其更进一步的革命意义，只能使自己的组织难以胜任更进一步的革命工作以及更能做好现有的墙外工作。

至于线下组织，其实也可以做几种区分，如合法和非法、公开与秘密的类别。但此类组织一般较少，我们暂时不详谈。专门的线下组织在我国还是很少的，他们往往和线上组织工作是重合的，往往是线下什么组织线上也有一个同样的组织，这样就使得线下活动无法专门化，也使得风险大大的增加了起来。经常有因为线上活动而导致线下人员被捕了的，其实其线下活动本没有暴露或出严重问题，也有线下工作暴露致使人员被捕而线上工作全部终止作废了的情况。把非法活动和合法活动以同样的公开或半公开方法来进行的，或者在线上线下同时的进行的错误行为更是数不胜数。一些左派群体还有把自己的线下会议和敏感的聚会拿到线上公开的幼稚做法，或是把秘密非法活动和线下的敏感活动拿去线上公开讨论的做法，这种做法除了招致警察打击致使今天的工作在未来会有被一齐捣毁外的可能而得不到更好的结果。

线下组织相比线上组织有更强的秘密性和能发展实际的革命工作的条件，他应该是利用这两点来发展秘密的、实际的革命活动的工具。而不是用来进行和线上同类型活动的工具。

我们之所以要区分线下、线上、墙内、墙外等等关系，则是希望我国的革命份子需要能区分自己工作的性质和其组织所规定自己的所能活动的客观范围，利用好各种组织工具以便更好的发展自己的革命工作为我国革命服务，以及更好的和敌人做斗争。

四. 今天我国工人运动距离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距离

现在在我国，每一天都会出现各种广义上的工人运动，仅仅只是看 CLB 网站的数据（中国劳工通讯），从今年一月到截止到 5 月 12 日，就有 419 起能统计到的工人运动，平均每天就会发生至少三起工人运动（当然我们认为实际情况只会更多而不是更少）。这个网站已经算是少有能系统性的统计我国的群众运动的平台了，自然，我相信绝大多数工人运动他们是无法统计进去的，特别是没有把消息传递出去的、被政府抹杀了消息、或是由于斗争规模太小以至于很快结束了的情况，在自己工作范围内遇到集体斗争情况的许多人应该都能从自己经验中感觉到很多斗争的消息根本没有传递出去便结束了。所以真实情况，只会比这个网站的统计数据多几倍到几十倍不等。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至少做了这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参考资料。

如果只看 CLB 今年的数据，其中建筑业的工人运动有 218 起占比 52.03%，制造业 105 起占比 25.06%，服务业 56 起占比 13.3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1 起占比 7.4%，教育业、采矿业、党政机关和其他各类加起来只有 9 起占比只有 2.15%。

当然一年的数据不足够说明，我们再把眼光放长远几年来统计。从 2015 年 1 月 1 日到 2023 年 5 月 12 日，8 年内共发生了 12940 起能统计到的工人运动，平均每天发生 4 起以上。建筑业在八年内发生了 5343 起工人运动，占比 41.29%；制造业发生了 2521 起工人运动，占比 19.48%；服务业发生了 2080 起工人运动，占比 16.0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发生 1890 起工人运动，占比 14.61%；其他所有类别加起来发生了 1106 起工人运动，占比 8.55%。

可见，总的来说建筑业始终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其次则是制造业，两者加起来，占八年内我国工人运动数量的 60.77%，这是我国阶级运动中的主要战场。而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则是次要战场，他们加起来占八年内我国工人运动数量的 30.68%。剩下的行业则是边缘战场了，它们全部加起来则有 8.55%。

在这八年所有工人运动的诉求中，欠薪讨薪类的运动就占 10343 起，占比 79.93%。其他的原因诸如加班、社保公积金、迁厂关厂、经济补偿金、裁员、社保等等加起来也只占 20.07%。无论怎么看，我国现在阶级斗争的性质都是经济斗争，还没有政治斗争的一点点地位。

从规模而言，其中有 10984 起都是 1 到 100 人的小规模运动，占比 84.89%；101 人到 1000 人的中等规模的罢工有 1786 起，占比 13.8%；超过一千人的只有 164 起，占比 1.27%。还有 3 起运动没有查到规模。所以，从我国工人运动的规模而言，小规模运动仍然是主流，超过一百人的中等运动则少见，而超过一千人的较大规模的运动更是稀少无比的。但从总的规模来说，八年发生了 12940 起工人运动，相比我国 7.33 亿就业人口来说，工人运动还是很少见的现象。按照大多数规模不超过 100 人而言，就算都按 100 人算，八年内只有 129.4 万人次参与了工人运动，就算乘以 50，也对我国 7.33 亿就业人口来说还是非常稀少的现象。工人运动不管是从规模还是数量上来说都是远远不足的，129.4 万人次只占我国就业人口的 0.17%而已，这还是用八年的总数来统计的，就算真实情况要比这个多得多，每年参与斗争的劳动者也应该难以超越 1% 很多。如果拿历史上的数据做对比，1922 年 1 月到 1923 年 2 月，在持续的 13 个月里，当时全国发生大小罢工 100 余次，参加人数在 30 万以上，而这个时期

中国只有 200 万工人，当年就有 15% 的工人参与了罢工。1900 年俄国工人数量为 205 万人，1905 年全俄政治大罢工就有 200 万人参与，算是整个俄国工人阶级都被调动了起来。我国今天的无产阶级占全国劳动者比重的 61.3%-86.6% 之间，取中间数则是五亿多工人，这样一看我们就能知道我国今天的工人运动距离革命时期还差多远了。

从斗争手段上来说，游行/抗议类有 7201 起，占比 55.65%；静坐类有 3082 起占比 23.82%；罢工有 1848 起，占比 14.28%；其他类型，如申请仲裁、联系媒体、阻塞公共交通、威胁跳楼、上访等等加起来只占比 6.23%。

总的来说，我国工人运动首先在运动规模上还很小，运动规模普遍在 100 人以下；在运动的斗争性质上还完全是经济斗争，还完全没有政治斗争的地位；在参与程度上大部分劳动者都还没有直接参与进来，估计每年参与工人运动的劳动者应该只有 1% 左右。所以我们确实是在革命运动的初期，甚至比历史上马列毛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那种初期还要初期一些，如果说我们经常谈论的历史上的革命运动初期是初中生阶段的话，我们今天则还在小学生阶段。当然我们不否认在未来运动会有迅速发展的可能，但我们也要帮助更多的群众通过参与斗争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并要帮助他们的斗争获得胜利，这不仅对于我国现成的经济斗争来说是很必要的，对于未来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更是必不可少的。

五. 革命的组织是革命的现实工具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距离革命还是非常的遥远的。说完这些简单的数据，我们再来看看我国左派组织目前对我国阶级斗争的作用。我们在前文已经说了一些了，这里打算再作一些补充。

从上面的材料就可以知道，我国的群众阶级斗争还完全是自发的经济斗争，并且讨薪是最重要的需求，这些斗争也都还是零零散散的小规模的斗争。这里看不到我国任何政治组织有力的干涉或支援，看起来报道、宣传、揭露、鼓动则是他们目前能干的唯一的事情了，而且由于线下组织这个重要革命工具的不发展，他们也能难把这种工作发展到现实需要斗争的工人那去，所以只能往暂时不需要的中间群体那进行，但我们知道即使是这样许多组织也是完全不去做这一点的。这里面自然有未明子等恶劣份子的负面影响，也有我国左派组织还普遍不发展、不成熟的缘故还远远达不到革命组织的程度。

从革命所需要的现实工具的方面来讲，斗争所必要的组织在我国阶级斗争中的各个范围都是缺乏的，少数已有的组织也还很不成熟的，总的来说是远远不及我国工人阶级现实阶级斗争的需要的。我国现实斗争中的工人们缺乏一切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如我国工人在斗争中即得不到足够的法律援助，也得不到在斗争上的经验的援助，没有供与学习斗争的斗争材料和走向更大程度解放和革命的政治材料，更没有其他团体的联合，这些都是各类革命组织该做的，它应该是提供这一切帮助的工具。其他的群众也缺乏材料去了解现在的斗争这自然使得他们难以革命化（这恰恰是也我们应该做的），他们更缺乏参与、帮助现实斗争中的人的合适工具，这种工具也必然是某种合理的组织。这些现象都说明我国阶级斗争始终不够发展、还始终受限停留于目前分散的、小规模的经济斗争和其他群体漠不关心、参与甚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能归于用作阶级斗争的组织的不发展的情况上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斗争性的组织是阶级斗争必要的现实工具，是劳动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现实工具；而革命的组织则是革命的现实工具，是保障被剥削者一切阶级斗争能够胜利、并能实现自己的解放的工具；在我们这种专制国家的情况下，这两种者是天然的盟友，我们必然要使这两者最大程度的联合起来，要战胜一切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想及组织们和我国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

这样的革命的组织便是使阶级斗争能够贯彻到社会每一个方面，使社会每一个方面都往革命的方向发展，并且是使社会最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并走向革命的工具。如果没有这种工具则一切革命活动都难以发展了，革命无法积累也无从诞生。如果我们停步不前，革命即使是再过一万年也不会到来。而我国目前的革命份子的首要使命就是要在我国阶级斗争的每一个方面创造这种能够被革命份子和未来更广大群众利用于斗争的革命组织工具，则各种类型的革命组织。

革命的规律、组织工具的规律、革命组织的规律

RSF 编辑部

一、革命使命对革命组织的政治要求和组织工具本身的客观规律

我们认为组织是一种革命的工具，不同的组织就是不同的工具。就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一切现实中的组织活动中，虽然我们线上的革命工作中已经有了一些现实中的劳动者在兼职参与我们的工作，但这个组织仍然是单纯线上的组织，只能做线上的革命活动，并且它还是墙外的秘密组织。自然这种组织工具有它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革命作用，但这个墙外的革命组织工具就它本身的影响范围而言是极其狭小的，甚至可以说是影响最小的一种工具。如果它不和其他组织工具配合起来，那它就是单纯的空架子、单纯的密谋社团而不能起到革命意义的作用甚至还不能做到它本身具有的那种不可替代性的作用。这是因为革命组织作为革命的工具是为革命的整体使命服务的，任何一种革命组织作为一种工具是不能代替革命使命本身的。具体来说，一定的、客观的革命使命规定了其一定的内部矛盾和发展规律，而革命组织它的一切政治性质、工作内容、发展计划不仅要服从这种工具本身的内部矛盾关系和发展规律，也更要服从革命使命总的矛盾规律和客观需求。故一定的革命组织工具为一定的、客观的革命使命所服务。

而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被剥削者欲消灭剥削解放自己的革命需求始终是客观的。这种需求给予了每一个时代劳动群众和革命者以重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是什么都不做就能完成了的，它恰恰是需要并且推动一些人去以极大的力量去做，这种重大使命是需要强大的主观力量才能够完成。这需要我们掌握革命每一个阶段的矛盾规律，了解使这些矛盾往革命方向发展的需求，才能利用起来推动革命继续向前。

而“组织”作为革命工具时，不同的组织就是不同的工具。它是推动矛盾往某个具体的方向发展的杠杆，要利用一种力来撬动另一种力，更要区别出具体的矛盾关系中（特别是我们力量极其弱小的时候）要区分出要利用哪一种力撬动哪一种力，有的时候更要尽可能的把事物或矛盾细分下去更具体的对付而采用更具体的革命工具。

但“组织”也有他本身的规律，在不作为革命工具时，这种规律遍存在了。而一旦作为革命工具，这种规律在客观上也要影响着或不同程度规定着革命活动。

如线上组织和线下组织就有其不同的规律，线上组织之间墙内和墙外组织也有不同的规律，而墙外组织之间更有各种不同的组织工具，只是从技术上来看微信群、QQ群、微博、YY等平台的合法社群之间不同的规律受到客观条件不同程度的规定和影响，从社会性上看工会组织、爱好组织、社群组织、职业组织、家族组织、学生组织更有着不同的规律。在不同的组织之间，自然有着完全不同的运动条件、不同的有利因素和弊端，而具体活动的革命者不仅要考虑到我国革命的规律和革命组织的使命也要考虑到组织工具本身的规律，从而作出更优秀的计划和更成熟的活动。

二. 目前我国革命阶段的特征和我们的革命使命

就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一切现实中的组织活动中，虽然我们线上工作已经有了一些现实中的劳动者在兼职参与我们的工作，但它仍然是单纯线上的组织只能做线上的革命活动，并且它还是墙外的秘密组织。自然这种组织工具有它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革命作用，但这个墙外秘密组织工具就它本身的影响范围是极其狭小的，甚至可以说是影响最小的一种工具。如果它不和其他组织工具配合起来，那它就是单纯的空架子、单纯的密谋社团而不能起到革命意义的作用甚至还不能做到它本身具有的那种不可替代性的作用。

所以我们就不得首先从总的方面出来。我们在进行过各种各样的革命活动后已经能够认清我国现阶段革命使命对这种革命组织的客观需求以及这种工具本身的特性了。我们把这两方面详细了解并结合判断就可以明白这种组织在今天的使命了。

我们从我国现阶段革命总的矛盾关系的政治因素出发，我们知道我国现阶段革命有这样几种特征或者说矛盾关系：

1.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需要消灭资产阶级专制实现无产阶级专制。我国社会客观上需要一场社会主义再革命。
2.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目前还保持着有力的法西斯专制，而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发展得还很不足。群众们的阶级斗争目前还远远不能伤及我国法西斯专制本身，而法西斯专制又在不断的限制群众们的斗争。是法西斯专制和我国群众争取自身利益的总阶级矛盾。
3. 革命理论和我国需要革命的阶级尚未结合起来。而这种革命的意识 and 革命的阶级相分离的矛盾导致我国劳动群众在政治上还十分落后。
4. 我国革命组织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我国群众阶级斗争的需求。在一切现实中的阶级斗争中都缺乏革命组织的帮助。
5. 我国进步力量的发展落后，革命理论上的不足和实践上的落后致使我国左派不断分裂的矛盾和现象还在产生，并大部分停留在左派组织的程度上无法进步。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解决以上的矛盾才能实现革命或者推动革命的继续向前。而其中第一条，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他则是次要矛盾。

解决第一个矛盾则代表我国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而解决后几种矛盾则能够推动我国革命运动的进步。社会主义再革命和一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在于，我们这个国家曾经完成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过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意识形态还以不同的形式遗留了下来并受人们所熟知（自然我国统治阶级也一直在歪曲过去），所以它是再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从另外一方来说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有所不同，过去的社会主义被资产阶级复辟造成了历史上鲜有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而独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都是从被过去的

社会主义国家被复辟后产生的（如苏联、中国、朝鲜、越南等）。而一般的社会主义革命则广泛的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这里面包含了多种社会主义革命；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需要无产阶级向私人垄断资产阶级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而我国历史上又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或者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使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在社会主义社会下继续革命的政策。可见社会主义革命有多种方式，十月革命是一种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历史上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是另外一种社会主义革命，而今天又要进行另外一种社会主义革命了。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要更详细的论述，但这就不是本文的目的了。但我要强调的是，我国革命的主要矛盾，我国革命者要利用的矛盾和要遵守主要革命规律便是这一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及完成社会主义再革命。但想要解决这一点，就需要最强大的革命主观力量，需要革命的政党，并且这个政党已经团结起了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并且还具有一定的革命武装，能够发起并团结力量完成暴力革命的任务。这一点自然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但很显然这不是我们目前有条件能够去做的，我们离这一步还有非常远的距离。

而第二个矛盾和第一个矛盾的区别在于。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也参与进了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这运动必然要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在许多活动范围中重合。但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他们往往在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之间动摇。资产阶级民主制也是一种资产阶级专政，它和社会主义是根本冲突的。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包含了着民主，自然这个民主主要是对无产阶级而言的，而对其他阶级的变化而言则是废除了法西斯专政并引导其逐步消除私有性质往无产阶级的方面过渡。所以只是废除了法西斯专政还不能保证我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无产阶级也还没有得到的解放。要解决这一点，也需要我国无产阶级很大程度上的调动起来，并和这一部分进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达成反法西斯的强力联盟来迫使敌人放弃法西斯专政，但是这一步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也不得不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因为我国军队全都是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直接控制的，很大程度上需要做许多和第一点同样多的工作，但我国庞大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去牺牲自己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资产阶级民主在我国也难有实现的可能，至少暴力革命是不可能完成这个目的的，除非是期待像苏联统治阶级一般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分化而使政权向另一个方向质变。

至于第三点，我们可以从之前引证的 CLB 数据（中国劳工通讯） 就可以发现。我国工人运动首先在运动规模上还很小，没有体现出充足革命的倾向，并且基本都是经济斗争，完全没有政治斗争的地位。这足以证明，我国最需要革命的阶级还完全不具备革命的理论，革命意识形态和需要革命阶级相分离便是我国目前无产阶级运动中最大特点。而要解决这一点就需要我国需要一定的革命组织，并且需要把革命工作达到这样高的程度，大量的向我国工人进行鼓动、宣传使他们完全的接受革命的观点并愿意以革命理论整体的进行有计划的革命活动，但这显然也是需要—个强大的革命党才能够做到的，如果没有—种组织能够充分的调动起全国的革命力量和革命份子进行有计划且整体正确的革命活动则完全不可能达到这一点。

关于第四点。我国群众的阶级斗争哪怕现在全都是经济斗争，不成功或者说没有后续的结果也是经常的现象。许多斗争从一开始就被镇压机关给消灭了并在更大范围内被增压机关给隔绝了消息。我国群众目前的许多斗争完全是由于自发活动着斗争经验的不足（自然他们本来就不以斗争为职业，除非经济到了困难的地步则不会出来斗争）、斗争的缺乏计划性、以及

其他方面的声援鼓动力量的不足而不得不失败。这就需要我国至少有一定的职业革命家来帮助他们，这种职业革命家依靠一定规模的革命组织来为帮助我国群众进行斗争和维护利益。但即使是这一点需求我国左翼分子们也还没有达到，我们还处于更初一级的阶段。

最后则是第五点。“我国进步力量的发展落后，革命理论上的不足和实践上的落后致使我国左派不断分裂的矛盾和现象还在产生，并大部分停留在左派组织的程度上无法进步。”我国左翼的分裂至今也没有终止的迹象。一方面是由于像未明子这样的机会主义者的泛滥，我们自然是要和机会主义分子斗争的。但另外一方面也有由于我国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落后，促进的这种分裂往各个方面发展并整体分裂得越来越杂乱的现象。一方面缺乏合格的革命实践（具体来说是一种组织工具），不能把我国社会各种反对力量都利用起来形成一个总联盟；另一方面缺乏合格的革命理论和它在我国革命中的理论权威（这也需要一种组织工具），能把一切机会主义的理论及倾向驳倒。最后，还有我国左派组织发展的普遍的初级性，秘密基本不存在，安全也难以保障，这样必然使得许多从左翼活动中产生的优秀份子不断地被我国警察所夺走。这些现象必然助长所谓的“左翼无限可分”的内部混乱，而不是促进民主集中。而这种现象实际上又是有利于敌人的，使我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各种反对派的内乱中有条不紊的各个击破。而这一点则是我们现在相对这几个特点中最有条件去开始去解决的，他也是相对最具体的一点，而解决了这一点我们自然就有了更大的力量去进行下一步。要首先形成成熟革命组织（在政治、安全、继承性上都要成熟），然后在政治上先达成一种我国先进革命团体的统一，在革命的实践和革命的理论都要进行这种统一，并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和我国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并和其他力量进行更大程度的民主联合，那么我们就很快可以团结起我国整个左派和我国全部进步力量了。

三. 一些组织工具的客观规律

单打独斗是不可能完成革命的，革命的活动总需要一定的组织工具，而这一切不同的组织工具合起来便是一种现实的革命力量。

如果说我国目前的革命阶段的特征和我们的革命使命，是我国革命者在一切革命的组织活动需要首先利用的矛盾和遵守的规律。那么我们在具体的革命活动中还需要了解一切具体组织的工作的客观规律，使它往革命的一方面发展，使它对革命起到作用，使它能够胜任起一部分革命的使命。

我们可以把现有的组织工具总的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类，这是最大和最一般的划分方式。这种区分是由于现代通讯技术的产生和工业的全面发展而造成的在工业国的两种巨大社会活动范畴的差异，它使所有人同时具有两种的不同的社会活动范畴，一种是线上（或者说网络）、一种则是线下。在落后国家这一点而还很不明显，因为工业落后、经济不发达和识字率低的缘故，大部分人还没被拉拢进这个两种社会活动的差异范畴。

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不是没有这种不同的社会活动范畴的差异，早在列宁时代或者马克思的时代或者更早的人类社会中就有报纸、书信等交流工具了，可以实现非现实活动的交流来造成者不同范畴的社会活动差异。但只是在使工业化到来的资本主义时代，这种非现实活动

的通讯工具和社会活动范畴的差异才开始被人民群众普遍的利用起来，反对党也能够借此在较大程度做到自身安全的同时又能联系起尽可能多的潜在反对者；这就使的群众运动能越来越具有政治性、理论性、计划性，使得阶级斗争能发展得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深刻；它使得政党得以轻易的凝聚起巨大的阶级力量，它也使得群众能够实现他们自己的总的政治主张。这促进着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发展到全新的高度。可能会有人怀疑这一点，正如现在许多资产阶级学者都认为现代技术已经消灭了阶级斗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团结起来，现代社会出现的多元文化和越来越复杂多样的政治诉求便是如此；我们要回答的是，这种现象不是技术直接造成的，而是资产阶级根据其统治利益而造成的，在一切上述技术普及的地方，都被资产阶级以自身的统治利益歪曲或限制了他们的作用，阉割、审核和修改一切网络声音和文艺作品、打击政治异见者和反对派、消灭革命诉求的声音等等。正如铁器运用在古代发展农业了中的生产力，使奴隶们开垦了荒地、拿上了武器促进了奴隶制的灭亡时，奴隶主也利用铁器来打造铁链加强对奴隶的束缚和镇压的阶级斗争一样；封建主在他们的时代在利用大炮来装备其军队的同时，大炮也在帮助农民和无产者们摧毁了旧时代城堡和骑士们的地位，在宗教等愚昧的东西使古代世界对于劳动者们来说又大又神秘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却利用指南针、天文学、物理学等科学技术使古代世界变得又小又熟悉，使推翻封建主的现实力量一天比一天结实；而今天的革命份子和无产阶级们应该利用起能够利用的一切现实条件和科学技术使自己更好的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以便于更好的解放自己。

在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时代，他们过去那种通讯技术（报纸、电报、邮件、固定电话机）还是一种不经常的、作为一种中介而进行二次传播的交流工具还比不上今天我们的工具，换互联网的术语来说，就是不能做到即使通讯和最大程度地对普及化。这几十年内（电脑、手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各工业国们共同的最新发展已经足够改变了我们今天政治活动的方法。资产阶级对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的改善必然也要使得无产阶级的斗争能够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发展起来。过去的全俄政治报需要依靠报纸传播和通过信件的方式建立起和线下活动者的联系，我们今天则完全用互联网便能更好、更彻底的取代以上的工作，但今天资产阶级对互联网的控制对付起来已经要比过去的书报检查制度麻烦得多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

再说具体的方面差别。我们知道线上组织和线下组织至少有这样几个重要的区别：

1. 线上组织这种工具在宣传方面相比线下组织工作起来更容易、影响更快；在传播的广度上也更大。线上宣传工作也许能做到一个视频、一篇文章能达到几万人甚至几百万人观看，但在现实中能聚集宣传几万人就是一种更为困难的事情了，哪怕只是数百人也相对线上影响几万人、几十万人更困难了，但聚集数百人观看自己的作品恐怕对于任何一个线上活动者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许多活动者在线上时期往往能经常做出数万、十万以上受众的影响力，而线下则往往下降到几十人或几人以内。这说明线上组织工具相比要比线下组织工具有着宣传上极大的优势。
2. 工作难度上，也是线上更容易、线下工作相对更难。在即时通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做到跨地区的、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分工合作，可以把政治活动的有计划性遍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参与者身上。而通过线下组织要做到这一点则难如登天。
3. 在实际力量方面，线上组织不直接具备任何现实力量。这种工具至多只能做宣传、鼓动、决策、分工、指挥等等作用，而这些作用不和现实力量配合起来就是空架子，仅靠它自己是

无法完成革命的任务的。而相反，即使是最小的线下组织也能够具有现实的力量，去进行小范围内的现实活动，能直接参与和影响不同程度的阶级斗争。这种组织和线下组织对比起来，一个是起大脑的作用，一个是起肉体的作用。

线上组织和线下组织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此。而今天的我们想要完成革命使命，那这两方面的组织工具都不能抛弃。可能会有教条主义者说，过去的革命者没有依靠过线上的组织工具，那个时候还不具备这样的工具他们就完成了革命。但今天的情况是，这种工具已经成为了我们这样的国家的国民生活中一种普及了的东西，变成了日常生活中一种必不可少的东西，即开始成为了群众在阶级斗争中也需要的工具，也变成了反动派镇压群众所必要的工具（反动派利用信息技术可以做到及时了解每一个地方的阶级斗争并有计划的调动全国力量来进行镇压，而过去的反动派难以做到这一点），难道我们还要去自发的抛弃现代武器用木棍和现代军队作战吗？

说回线上组织。在线上组织中，又有着墙外和墙内的区别，这种区别是我国统治阶级根据其阶级利益造成的。使一部分互联网的范畴变成受统治阶级直接控制部分，和墙外的部分则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墙外的线上组织至少有着这样的特征。

1. 首先它是一种线上组织，由于其诞生于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出的最先进的通讯技术——互联网，所以它具备这种技术的客观规律所规定的特征。即它是具有易传播性、易宣传性的传播工具，是具有全国性、国际性和即时通讯的通讯工具。而线下组织则相对更缺乏这种能力。但它同时又是不具备直接现实力量的组织工具。
2. 它然后是墙外的线上组织。相比墙内宣传组织它具备了克服资产阶级的监控和渗透的可能，使它可以同时具备相对最隐蔽的特征，也就是相对最安全的特征。而墙内的线上组织则是与其相反。
3. 由于墙外的特征，它必然是受众小、门槛高、技术要求高、不易扩大成员的线上组织。这个特点大大的削减了线上组织易传播、易宣传的能力，和墙内的线上组织相反。也就是说它如果不和墙内组织或线下组织相结合，它就不能补充它在墙外的力量。

除了线上线下、墙内墙外的分别外，革命的组织工具在实际活动中自然还会遇到需要更进一步区分的时候。比如线下组织在很多时候也需要区分出合法与非法、秘密与公开的区别，墙外组织也可以区分出秘密和公开的区别。但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所谈部分，并且根据我们目前实践的进程，我们这里暂且谈到这一步为止。

四. 革命组织工具的发展规律和它的使命

谈革命组织工具的发展规律和它的使命就得结合我们的革命使命和组织工具本身的客观规律的两个方面来综合判断。

如，我们结合我国革命需要成熟的革命组织的特点（在政治上、安全性上、继承性上都成熟的组织）和各类组织工具的客观规律。我们得出，这种成熟的革命组织的主体应该依靠墙外线上组织的载体。这种载体由于其网络通讯工具的即时性、国际性和墙外的安全性极其适合充当革命的大脑组织的作用。

这种革命组织至少要承担这样的使命或者说它至少具有以下特征：

1. 在总的革命斗争中它是集中一切革命的力量，进行最高一级的战略决策和军事指挥的司令部。
2. 在组织工作中它是我国全部革命组织的核心，它直接负责我国革命的总使命，并要一切的革命组织受它指挥，并由他进行总的分工。
3. 在理论上它是集中我国革命者和各方面群众革命实践经验，并根据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给全国革命提供最正确、最先进、最前沿的理论指导和思想路线的意识形态基地。

而这一些作用恰恰和墙外线上组织的特性结合了起来，它相对最有条件优秀的完成这样的使命。把这种革命使命和墙外的线上组织工具的规律结合起来，便是这种革命组织内在的矛盾关系和规律。一面是政治的主观属性，一面是物质的客观属性。当然对于革命来说，这些使命虽然是至关重要的，但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有许多革命使命需要依靠其他类型的组织工具来完成，这就需要我们还要发展其他类型的革命组织工具。

毕竟线上只是线上的革命工具，而线下则还需要线下的工具了。特别是发展现实的革命力量就离不开线下的组织工具。

我们目前只能够通过学生组织这种工具来从线下挖掘出实际的革命力量。这自然是由于我们目前活动的狭隘性、初步性所至，我们的挖掘方式必要要受这种工具的规律规定。

然后我们要从这种工具培养出力量，用编辑部或其他的线上组织工具来把他培养成别的力量使他们未来能够发展别的工具出来，这就要处理好这些不同工具之间的关系。怎么利用好这种工具来发展新的力量（学生组织），并能利用这种工具很好的培养他。然后又要如何利用不同的工具来使它变成别的以一種革命力量。而不能浪费这些力量，用单一的一种工具限制死每个革命份子的前途，这实际上也是限制革命在其他方面的发展。

总得来说，我们目前只能发展学生的革命组织这种工具。我们有三种利用他的方式，第一种就是通过这种线下学生革命组织的工具发展出革命力量（这种工具发展革命力量还只是学生），并要使他们未来能变成另外一种力量发展别的组织工具。第二种就是也要继续传承和发展这种工具，使他能够影响、团结、挖掘更多的学生。第三种就是通过这种工具的力量，特别的挖掘出少数优秀份子，使他们在未来发展出新的更高级的革命组织工具，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更高级的革命组织或革命家组织。这么来看，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的革命组织的特征

和各个份子对革命不同的作用，来决定这些份子在各个革命阶段的作用、能够完成的独特的革命使命、以及如何最大程度的利用他们的力量。所以我们目前的线下学生革命组织的同志们要考虑就是如何最大程度的利用学生革命组织这种工具，以达到这种学生革命组织所具有的三方面革命使命。

而这种组织他的政治路线、组织纪律、工作内容、发展计划，都是配合以上的政治特性的。

自然，这三个方面都是应该做的，它们应该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但这三种对革命使命也是有主次之分的。目前在我们看来，学生组织本身的作用也就是第二种作用它是最次要的。主要目标在第一（发展其他方面的力量）和第三（和发展更高级的革命组织），其中第一方面又主要以培养融工队伍为核心，使我们能转化出一批未来能发展工人革命组织的力量。两者之间，至于哪个更重要，我认为是发展更高级的革命组织，它是做第一点的基础，如果没有更高级的革命组织则难以实现两种革命力量的自由转化，难以实现多种革命力量的统筹规划。

在学生时代，对于每个份子的利用大部分要靠学生组织自己完成，大部分份子也主要靠学生革命组织这个工具本身来利用。我们编辑部这样的线上革命组织或者是未来更高级的线下革命组织，主要培养其中的少数，也就是有条件发展为别的力量和更高级力量的份子。而这一切份子从学生组织离开后，我们就要用新的组织工具来利用起他们的力量了。

第一，要考虑每个份子的情况，给编辑部或当地更高级革命组织说明清楚其情况，了解清楚他们未来可能的动向，并引导他们。未来由我们的其他组织在非学生时代联系把他们负责起来，并使他们承担一部分组织任务发展别的力量和组织。

第二，培养学生组织的后续继承人，保证这个组织能够继续持续性的发展。

第三，挖掘出特别优秀的份子，使他们能够组建当地更高级的而不是单以学生这个职业为限定的线下革命组织，并直接负责起更多方面革命组织的发展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定义和产生条件

RSF 编辑部

我们发现在许多左派对于法西斯的定义还十分模糊，更别说它的产生条件了。我们在这里根据一些历史材料做了一个初步的研究和结论。

一.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科学定义

近现代的第一个法西斯主义政权，或者说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一个法西斯主义政权诞生于1922年的意大利。法西斯是意大利语的音译。这个政权的创始人就是臭名昭著的墨索里尼。这种制度一出现于意大利，随后就在德、日、西班牙等国相继出现。除了这些国家以外。国民党蒋介石的王朝和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也都属于法西斯专政。

但我们不能只是说说历史上的结论这么简单。关于这种政权的特征，我们要做一个总结，所以我们需要引用一些别的说法。

让我们首先看看主要的百科网站是怎么评价的，现在很多的百科网站作为总结性的网络科普工具，对于一些话题往往是归纳了多种观点来进行总结的。虽然这种做法很多往往把很多杂糅、多余或错误的东西混杂了进来。但总的来说还是由参考的意义，我们可以批判性的汲取。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威权的极端民族主义形式。其特点是对国家领导的个人崇拜、重视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公共机构拥有过度的公权力，强大的社会和经济统一执行力，以及强制镇压反对意见。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初的欧洲政治中有着显著的地位。第一次法西斯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王国出现，由贝尼托·墨索里尼创建，也是法西斯革命党（他日后执政的国家法西斯党的前身）的创始人，然后传播到其他欧洲国家。法西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民主主义，因此被放置在传统左右翼政治光谱中的极右翼。

法西斯主义者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一场革命，它为战争、社会、国家和技术的性质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全面战争的出现和社会的全面动员，打破了平民与战斗人员之间的区别。‘军事公民身份’出现了，即所有公民都在战争期间以某种方式参与军事。这场战争导致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崛起，这个国家能够动员数百万人在前线服务，提供经济生产和后勤支持他们，并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干预公民的生活。

法西斯主义者认为，自由民主已经过时，并认为在一个极权主义的一党制国家中完全动员社会是必要的，以使国家为武装冲突做好准备，并可有效应对经济困难。这样一个国家由一个强大的领导者——如独裁者和由执政的法西斯党成员组成的军事政府——来领导，以建立民族团结、维护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拒绝断言暴力本质上是消极的，并将政治暴力、战争和帝国主义视为可以实现民族复兴的手段[法西斯主义者主张反共，采取混合经济，其主要目标是通过保护主义和干涉主义的经济政策实现国家经济自给自足。极端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者则通常持有“种族纯净”或“优等民族”的信仰，通常与种族主

义或偏见的某种形式相呼应。这种“纯净”的思想会驱动法西斯政府将视为外人的群体驱逐出境，屠杀，强制绝育或是种族灭绝。

—《维基百科》

但显然这些总结还是有问题的。就第一段来说，因为一切形式和性质的国家都有权威，国家本身就是实施权威工具，在阶级社会种必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施权威的工具。关于其他的方面我们先暂时不论，让我们再来看看百度百科的定义。

法西斯本义是“束棒”的音译，是一把被绑在多根围绕在一起的木棍上的斧头，在古罗马是权力和威信的标志。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结合了社团主义、工团主义、独裁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式的军国主义、反无政府主义、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政治哲学；《大英百科全书》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个人的地位被压制于集体——例如：某个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之下的社会组织。”

—《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的论述更简洁了一些，但结论却是抛出了一团更复杂的乱麻，把问题搅乱了。我们这里就不再详细这两个百科里具体引用了哪些学者的说法。但他们对于各类学者相关论述的总结明显的把“法西斯”这个问题搅成了一个染缸，完全让人摸不清头脑，只会给人留下各种不科学的、模糊的印象。在这里呈现给我们的只有一堆复杂现象的综合，没有区分出特殊性的和一般性的。这是完全不科学的做法。根据这两个百科的总结，法西斯至少有如下的特征：个人崇拜、重视意识形态宣传、过度的公权力、强大的社会和经济统一执行力、以及强制镇压反对意见、反共、反无政府主义、反自由主义及民主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是极右翼、全面的动员与参与战争、一党制、军事政府、将政治暴力-战争和帝国主义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手段、保护主义和干涉主义的经济政策、一种特殊的政治哲学（结合了社团主义、工团主义、独裁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式的军国主义、反无政府主义、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个人的地位被压制于集体等特点。

这实在是太过于混乱了，这些特点明显加起来简直是一个染缸。完全不能帮助人更了解这一个问题而是把问题弄得更麻烦。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就是繁琐、无用且不科学的资产阶级方法。就里面这些特点来说，的确是有很多是真实存在过的现象，但这里面列举的很多特点往往是其他的政治制度或别的科学概念也同时拥有着的。难道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意识形态灌输和权威的事实吗？使个人服从于集体的只限于法西斯主义、法西斯制度而不是其他一切国家吗？反对具体各类主义的只有法西斯主义吗？所以这样就完全区分不出一个事物和另一个事物的特征了。所以我们需要区别出一些首要的、具体的条件而不是无条件的情况或现象，我们要明白它首先是什么其次是什么最后才是什么。只有这种确定了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谈论它的定义。我们自然知道一般性也是寄寓于特殊性之中的，但没有一般性也就没有特殊性。

但我们知道，法西斯主义它可以是一种思想，也可以是一种政治制度。当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时候，它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具体出现在一种的国家，而后形成一种特殊的国家的特殊的制度。诞生出它的国家就是它的存在条件。法西斯制度最早诞生于1922年的意大利，关于这一点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各种资产阶级专家都承认。也就是它首先诞生于一个资

本主义国家，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然后这种制度又出现在其他一系列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然后又出现在一些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二战中的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维希法国等）。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出，当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时候，它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很多时候又往往产生于帝国主义国家。但关于这个“很多时候”，即这种制度如何产生于帝国主义国家和非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之间的条件区别则是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了。

所以，当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时，我们还不得不引入采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来判断。

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抛弃资产阶级“民主”的外衣，公开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用暴力摧残一切进步群众组织，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和一切进步运动，叫嚣“优等种族”有权统治“劣等种族”，发动侵略战争。法西斯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向劳动群众施行的最残酷的进攻，就是横行无忌的民族侵略主义和强盗的战争，就是疯狂地反对革命。

—1975《哲学小辞典（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法西斯主义制度除了有资本主义的首要前提外。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抛弃资产阶级‘民主’的外衣，公开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用暴力摧残一切进步群众组织，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和一切进步运动，叫嚣‘优等种族’有权统治‘劣等种族’，发动侵略战争”。但我们论的是法西斯主义制度，这里还明显说的是法西斯主义的整体，包括思想方面的。所以法西斯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应该是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施公开的白色恐怖统治。也就是说它首先是完全的、彻底的资产阶级专制，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制。那么就核心而言，实行法西斯主义制度毫无疑问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核心。这种特征把一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压迫通通强化到了最高的地步，又把资本主义中的改良或者说喘息空间消灭到了最低地步。至于法西斯主义其他的特征便是此基础上体现出的内容。如：“公开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用暴力摧残一切进步群众组织，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和一切进步运动，叫嚣‘优等种族’有权统治‘劣等种族’，发动侵略战争。法西斯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向劳动群众施行的最残酷的进攻，就是横行无忌的民族侵略主义和强盗的战争，就是疯狂地反对革命。”这种制度的前提规定了它的内容必然是残酷的、血腥的，这种残酷、血腥又必然时时刻刻和被压迫的各阶级、各民族的命运联系着的。这些是由更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很多时候是帝国主义国家）和阶级社会的前提条件所规定出的内容。但究竟要以何等形式或方法来实现这种残酷、血腥的内容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特殊性了，所以也必然产生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制度。

所以关于法西斯主义，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结论。要求实现法西斯主义制度便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内容，法西斯主义国家则是主要的实行了这种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法西斯主义制度就是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完全的、彻底的资产阶级专制。它把一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压迫通通强化到了最高的地步，又把资本主义中的改良或者说喘息空间消灭到了最低地步。就其内容而言必然是残酷的、血腥的，这种残酷、血腥又是和被压迫的各阶级、各民族的命运时刻联系着的。

二. 法西斯主义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知道法西斯主义是什么了，我们再来看看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国家是如何产生的。

不要训斥，而要辩论、说服。欧洲工人从历史上就同议会民主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明现在资产阶级背弃了民主，正在向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转变，因为它不会用别的办法进行统治。与过去不同，对于工人来说为争取议会民主而斗争现在已经没有意义。

对于欧洲工人必须耐心地、易懂地说明为什么议会民主对工人阶级已经没有价值。以前在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需要通过民主让工人阶级跟着他们走，为此作出某些让步。现在它在战胜了封建主义之后，面对着新的敌人——无产阶级，而且还要在资本主义危机条件下克服极大的困难，它就不能用议会民主的办法进行统治了，它便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在所有国家，资产阶级都会向法西斯主义转变。英国也一样，尽管形式有所不同。

—斯大林《致奥地利的信》

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

—1975《哲学小辞典（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

“在资本主义危机条件下克服极大的困难，它就不能用议会民主的办法进行统治了，它便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和“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这两条件看似是矛盾的，其实是指的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帝国主义矛盾空前激化主要是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外因，它推动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整体的发展而不只是制度，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许多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中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国家。从全球范围内的整体上来看，帝国主义的矛盾不仅体现于国内的阶级矛盾（这种阶级矛盾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更主要的体现于其它地区的阶级、民族矛盾。但内因才是矛盾的根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危机才会导致其政权的更替，外因在这个时候才会起重要作用。

可见，国内的资本主义危机才是使资产阶级民主制转变为法西斯主义制度的主要内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内外因素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便会开始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并且随着阶级矛盾的发展，在所有国家（我们认为甚至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都会向法西斯主义的方向转变。只是根据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表现形式有所差别。

除了资本主义国家以外。我们也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解决自身问题也是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那这种从社会主义国家退为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法西斯主义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毛泽东《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是会退化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而且往往会直接被复辟为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上也都证明了这一点。这还只是政治制度的方面，我们也知道，我国更是质变为了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的国家，而这类国家基本都产生于从社会主义国家中复辟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社会主义国家是以怎样的条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列毛主义者都知道，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不同路线的矛盾，也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內部主导关系便是导致到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关键。但这个内容就更复杂了，且和本文要论述的东西无关。

所以我们已经可以做一个初步的总结，法西斯主义国家至少能从这两种方式中产生：

1. 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的危机中产生
2. 从社会主义国家被复辟中产生

所以未来也有可能还会出现这两种主要类型的法西斯主义国家。一种是以我国、朝鲜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另一种则是在民主制的危机中产生的法西斯国家，目前我们还很难找到类似历史上的例子，但我们差不多可以从一切民主国家中发现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和倾向，在意大利、波兰、法国、以色列等等的极右翼政党，他们开始掌握或者不断尝试掌握其国家政权并开始不同程度的破坏其民主制了。哪怕是在台湾地区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倾向，民进党的不断破坏台湾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尝试，军国主义的发展，《全民防卫动员法》的例子都说明着台湾地区法西斯主义的全面发展。从国际上来看，法西斯主义已经开始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中快速发展的事物。

第二部分 路线斗争

政治是最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把第二部分当作刊物第一部分的补充内容；另一方面，我们会在这一部分中具体的收录部分关于这部内容的路线斗争的文章。而在这一期我们收录部分关于布站和东风频道目前的路线斗争的文章。这一方面的路线斗争是关于线下实践和组织问题的，并且由于我们左翼运动的初步性，以上问题又不得不和先觉醒的一部分学生们的活动很大程度上关联在一起。

对于如何实现革命的实践特别是线下的实践即其组织的问题，对于我国左翼运动和我国学生运动来说都是较为重要的。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已经公布了RSF目前的部分实践机器方法，我们在这一部分中则重点收录布站和东风在相关问题上的路线斗争和经验。

布站方：

融工的战略与策略——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谋略

世界上不存在空洞的、盲目的、没头苍蝇式的融工。马列毛主义者对于融工的一切计划都是围绕着革命事业尽快胜利而去设计与努力的。

革命工人运动与工联主义运动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前者要夺权，而后者仅仅是维权。因此在形成了先进工人群众、建立了对群众的领导权后，革命工人运动就要发动夺权斗争。斗争可以有多种形式、名义，但核心的一个目的应该是夺权——就是努力限制、剥夺资本家的权力（从企业内控制生产、欺压工人的权力到控制整个社会和国家、压迫全体劳动者的权力），并建立工人阶级独立的权力机构（详见“代表会议”的策略）来掌握夺取的权力。**当工人阶级的权力机构从一个工厂发展到整个工业区，从一个工业区发展到全国范围时，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对于佳士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冲天斗志印象深刻，他们的斗志是如何被激发出来的呢？又是如何在后续事态的发展中遭受了挫折呢？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列毛主义的融工战略与策略与机会主义路线之间的区别。下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梦雨硕士毕业后来到广州经济开发区，在接连被两个中介忽悠后，进入一家日资汽配厂——广州日弘机电有限公司，开始融工。日弘主要给东风本田、广汽本田和日产等整车厂生产发动机和离合器的弹簧。一年半后，因为要进行工资和年终奖集体协商，生产现场的员工推选她作为员工方协商代表候选人。这意味着梦雨进入了**熟人网络**。往年，员工方协商代表基本由工会主席指定，这一次大家信任她，推选她来当这个代表。

小胡（胡平平）大学毕业后来到了广州艾帕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做了三年普工，帮助艾帕克乃至整个黄埔区的劳务派遣工，拿到了欠缴多年的公积金，让艾帕克的劳务派遣工全部转正。这也意味着小胡进入了**熟人网络**。吴海宇和小胡是同一时间进艾帕克的，作为承包工，大家成为朋友。海宇替人出头，被打击报复，调到了最累的工位，海宇想离开，小胡启发海宇，灌输马列毛主义。海宇有了自己的第一本《毛泽东选集》，然后又有了第二本、第三本。他一有时间就去找小胡讨论，后来小胡说：“现在海宇懂得比我要多啦，他已经是我的老师啦！”海宇发现，自己曾经那个行侠仗义的梦想实在是太幼稚了，一个人再有力量，能打败世界上所有的黑心老板吗？如果说世界上真有那么一个无所不能的大侠客，那一定就是毛泽东思想了！

梦雨和小胡的融工实例都证明这个熟人网络的存在。这一经验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是一致的。主动融工的学生是这样，已经是工人阶级一员的先进分子们更是如此。尚杨雪不满18岁就出来打工，打工四年经历很多次罢工，她是赛格晶端的谈判代表。通过斗争，争取到了比劳动法标准还高的赔偿。她在劳动局遇到万宝丽厂的维权工人，当即就加了维权工人的微信。随后帮忙把消息转发到各个微信群，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她是佳士建会积极工

友刘鹏华妻子伍双的同事，两人关系特别好。伍双告诉她自己丈夫被打，又给她发了消息说他丈夫被警察抓了，理由是袭警。于是，她挺身而出，来到燕子岭派出所要人。

熟人网络是什么？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你是好汉我挺你。胡志所在的万晖厂的工人历来有团结斗争的传统。几年前，因为万晖厂整月整月的加班，又不按劳动法算工资，大家集体罢工，并去市政府上诉，厂方迫于压力答应了诉求：周末固定休息，平时加班1.5倍，周六加班双倍工资，加班自由，之前少给的加班费和20%的滞纳金也全额补齐。胡志把师傅英姐的遭遇诉诸自媒体，遭到开除，被开除的当晚，胡志去大哥大姐家里作客，讲到被开除的事情。原以为大家可能不理解，不料大家都知道他被开除的原因后，都为他愤愤不平。亲不亲，阶级分。大哥大姐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他煲肉汤、切水果，透露给他万晖以前的黑历史，还介绍他到熟悉靠谱的老乡厂里工作。

上述的这些鲜活案例与《翻身》里的案例有十分相似的部分，但为什么事态发展的走向却完全不一样呢？本来融工的学生以及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已经在正确的方向上走了一定的路程，而且这个正确方向只要与夺权相结合，一个堡垒一个堡垒地去突破与攻克，一个鹿砦一个鹿砦地去翻越和剪除，革命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机会主义者为什么要孤注一掷地抛弃已有的**熟人网络**而去作毫无胜算的政治冒险呢？原来他们需要在更大更“黑”的工厂里发动一次更有影响力的行动来实现一些机会主义者嘴里的所谓“以势压人的战略”。仿佛他们靠虚张声势就能把中修吓倒一样。这种迷信政治影响力的做法，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对此有深刻的评析：“小资产阶级擅长于吹牛，在行动上却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这个阶级的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小本经营，很容易给它的性格打上缺乏魄力和进取心的烙印，因此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同样的特点。所以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动起义的；一当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了起义，它就迫不及待地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对立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本来可能有的取得胜利的小小的机会，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或者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里则是这样辛辣讽刺那些迷信政治影响力的机会主义者们的。毛主席说：“人民没有组织起来，齷齪的东西多得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话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所以包括“熟人网络”在内的“地下网络”发展壮大才是马列毛主义的融工战略，背离这一战略去追求所谓的政治影响力都是错误的，这已经被最惨痛的实践所证实。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种典型的错误策略，那便是在反动统治下过分依赖所谓的“合法形式”，认为只有这些“合法形式”才能吸引更多的工人参与进来，似乎没有这些“合法形式”融工会寸步难行。然而实践的结果是相反的，有了这些“合法形式”才寸步难行。NGO组织开张了，注册公司，寻找办公场地，然后通过媒体轰轰烈烈宣传一把。但是这些“合法形式”给了敌人口实，什么“非法经营”，“偷税漏税”，都可以扣上来。为了维持了这些形式而耗费了有限的人力与物力。这是想打“堂堂之仗”的策略，“乞丐与龙王比宝”的策略。

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都有着大量改良主义NGO来充当劳资之间的缓冲器和调解人，以缓和阶级矛盾、安抚工人阶级。这些NGO对资本主义往往是小骂大帮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助手。然而中修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出于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独霸地位的考虑，对这些改良主义的NGO也不能容忍。实践已经证明：在中修治下，与群众相结合决不能依赖于任何“合法”的、“公开”的、“改良”的形式。这些形式，表面上比较安全、受到阻力小、活动空间大，但实际上先天就受到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限制，并且是在资产阶级的严密监视下。这些形式，实际上就是使自己始终处于明处，而资产阶级却能居于暗处随时监控。这就使得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群众力量通过这些形式发展到资产阶级难以容忍的程度时，资产阶级就能随时予以打击、镇压，而这些形式对此则缺乏还手之力（要实质性还击必然突破“合法”、“改良”的形式）。

当然，“不依赖”的意思不是说不能利用这些“合法”的、“改良”的形式，而是说到工人中去不能把这些形式作为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群众工作渠道，不能对这些形式寄以太大希望，不能把主要的群众工作力量投入这些形式中而轻易暴露给资产阶级。开展群众工作，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灵活机动，而不能依赖于任何固定、有形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在中修治下，任何有形的形式必然要引起资产阶级的警惕和打击。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发挥创造力，多创造出一些手段、名义，并经常变换，使得资产阶级摸不着头脑。关键是要建立与工人群众的实际的紧密联系，并施加革命的影响，而同时要尽量避免任何有形的形式、名义。群众的汪洋大海是最好的保护。**中修再穷凶极恶，也没有力量去监控大多数群众，不可能抓捕大多数群众，这是反动派必然不能阻挡群众斗争的根本原因。养鱼的小池塘未必能起大风暴，比如梦雨所在的日弘，小胡与海宇所在的艾帕克，胡志所在的万晖。但是有上千千万万条鱼就能变成蛟龙了，而蛟龙遇到了大海就能掀起巨浪。

以上就是马列毛主义的融工战略与策略的应有之义。

炮打以东风为代表的泥潭主义路线，真理与权威的抉择，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编者按：

1、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尝试，我们不怕犯错，但不能一错再错。自己陷在泥坑里，不愿睁眼看现实，拘泥于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条死路的错误经验，为什么还要扒拉身边已经在前进的同志呢？停止这种碌碌无为的行为意义上的自我感动吧，我们要的是红旗再次升起的结果！只有通过搭建革命脚手架和长期扎根，构建包括“熟人网络”在内的“地下网络”，并使其发展壮大，在全国各地形成我们的有力节点，包括各种形式的先进分子和劳动群众小组——我们才能真正有一支支可以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力量。（3）

2、现在仅仅沉迷于调研和开左翼圈子内部的冗长的研讨会，那就是陷入了泥潭，裹足不前，无法真正的推进革命，根本毫无意义，已经落后于形势。现在必须跳出舒适圈，去和广大的劳动群众接触，去团结他们，去尝试领导不是左翼的劳动群众，这才是正确的路线。实在是做不到正确的路线可以拥护，但是为了面子而反对正确的路线是很下流的。（3）

3、融工工作正当其时，不能停留在冗长的研讨会，更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更多地讨论工业区具体情况，交流具体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做工人组织工作做好准备，真理与权威的问题，既要讨论，更要实践，马列毛主义者是时候做起来了。（2）

爱真理还是爱权威？主要矛盾还是次要矛盾？革命还是改良？以东风为代表的调研路线在左翼内盛行已久，如今，已和我们所代表的融工路线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而他们在历史中也总有出没，列宁对他们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词语概括——泥潭主义。

什么是泥潭主义？顾名思义，是一群不走大路，而是在泥潭中扑腾，并且甘愿自沉的一类的统称。他们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大兴调研路线，在知识分子中大开读书会，认为我们应该读原著而不是以现在的布站材料为主，以及不愿意与工人阶级一同面对困难，一问就是时机不成熟，理论不够多，准备还不充分。如若调研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实践，那么这些个调研成果再多，都仅仅是为了满足部分人的左翼 cosplay 的虚荣心与购买小资的赎罪卷。毛主席曾说过：“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无产阶级战士，就看他是否愿意与工农阶级相结合。”

笔者应严肃指出，调研路线与融工路线是有质的差别，就像鸡蛋与石头，前者积累再多，不过是从一个鸡蛋变成两个，三个，四个以及等等，后者哪怕尽管现在欠缺力量，但是如若一直坚持下去，我们每积蓄的一点力量，都是石头的分子。并且，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已然看到了这些泥潭主义者的结局，要么是取消革命，要么是默默无闻，要么是改良主义，因为他们从未想过革命，所以说，革命与改良也有如上所述的本质上的差别，其实就是这么个逻辑。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融工路线，并且强调最主要是去产业工人中，这是因为客观矛盾的存在，如今，阶级斗争是最主要的，也是最为严峻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中，被压迫最严重的群体，就是产业工人，这并非是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信口胡诌的，在布站有大量的调研数据供我们参考，于是乎，泥潭主义者若是想批判我们不调研搞盲动主义，也是要让他们大失所望的了。

所以，尽管是同一阶级，但是不同阶层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压力都是大不相同的，这绝非是我们主观意愿所能改变的一件事。

但我们也并非是说做其他群体的工作，但也正如笔者在一开始所言，主要矛盾还是次要矛盾？如果搞错了这个问题，就会出现难以预料的结果，新生的脆弱左翼组织极易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并且新生的先锋队在相对弱小的现在，如何充分利用全部力量解决问题，就是一言蔽之：“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们不是说刀柄刀把绝对不能用钢锻造，但若是先把好钢用来锻造他们了，刀刃可就要用次一点的材料，到时候对打起来，咱们可以用刀把对敌人造成大量伤害吗？**于是说，刀刃就是现在的产业工人，刀把刀柄可以是脑力劳动者，也可以是进步学生，也可以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等等。

在现有客观基础未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分散力量然后搞成小聚居的形态，并且将大量的精力花在革命积极性相对薄弱的脑力劳动者的工作上去，而鄙薄产业工人，认为体力劳动者必将消亡于是就不做太多工作，这绝非是唯物主义者。以自己的主观思想为先一性，还是以不随主观意愿改变的客观事实为先一性进行思考，我希望泥潭主义者好好问一问自己，你们的出发点是自己的喜好更多一些，还是客观事实更多一些？

以及为什么要鼓励同志们去产业工人中进行工作，不仅仅是扎根积蓄更多革命力量发展先进分子，最关键也是帮助我们进一步革除身上还残存的私有制观点。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如若长期浸润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氛围中，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与革命热情都是有极大的损耗的。而这些虽然可以通过自我学习名著来革新思维，但是最多是达成此消彼长的一种脆弱平衡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有些明明可以不必发生的事情我们没必要再去做，而如果是自己始终眷恋着原先的小资产阶级生活，那将是最糟糕的情况，而这将是泥潭主义者身上最显著的特征：沉浸于观念上的一种理论堆砌，但从未对于思想换过血，革过新，最后就是创造的再多理论，都会很快腐朽。然后他们多会来一句，群众工作好难做，革命好难成功，咱没有革命热情啦。他们从始至终哪里想过革命？有哪一点像唯物主义者？

我们来分析一个思维公式，“难做”到“难成功”，这是什么，不就是唯心主义那套以“主观意识”为先一性进行问题的分析吗？如果难成功是因为客观矛盾未充分积累，以及先锋队的成熟度不高等等，那这是不随人主观意识更改的规律，他们以自己的个人喜好然后搭配上一些繁琐哲学的“数据论断”，搞泥潭主义，最后还是回到改良主义的怀抱当中。

以及笔者最想问的一个问题，**爱真理还是爱权威**，这直接关系到新生先锋队的存亡问题。

爱权威者，认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只是我们左翼的理论基础还不够，于是不能传播到工人群众当中，革命能不能成功，只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具有学识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及新生的共产党的建立也被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于是他们大搞秘密集会，大搞冒进主义路线，大搞“学术创新”，并且拉着其他年轻的左翼进步分子加入他们的群体，读书会越办越大，过着组织生活的人反而越来越少，大家只想争夺那唯一的原著解释权。

唯心主义者从不会去看一眼现实，对他们而言只有停留在脑子里的主观想法，今天想了，于是今天就去做，明天不想，于是明天就觉得不可能，信真理不如信权威，他们如是说到，只有集结在权威的旗帜下我们才有一丝希望获得成功，就算是写再多卷历史唯物主义的材料，他们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忠实信徒。

爱真理者，不会放弃一个知识学习的机会，也不会放弃一次检验自己所学的是否属实的社会实践的机会。马克思主义从诞生起，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而不是阁楼里落灰的书卷，马列毛主义者如若不与其所服务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斗争相结合，他的理论创新将完全没有一点符合真理，真理到底是说的人多了就是，还是说在社会实践中发现，这是不随人主观意识改变的客观事实。如果后一条成立，就算知道的人再少又如何，而就算前者在社会上有最高话语权，都改变不了他是谬误的一方，修正主义再怎么用他的喉舌标榜自己的正统性，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我们相信吗？不信对吧，那为啥，因为我们在社会实践中，看到了大量存在的劳资矛盾，这是他怎么也消灭不了的证据，更不用说现在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现象等等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规律。

最后笔者用列宁导师的一句话作为结尾语：“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东风方：

靠熟人网络发展地下网络，然后再夺权——评大群老管理虚幻的融工策略

认真读了大群老管理最近发的《融工的战略与策略——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谋略》，简直惨不忍睹。这篇根本就没有什么战略和策略。无产阶级的战略应该回答未来是速胜还是持久战，要从哪些基本工作入手，最后实现何种组织框架、建立什么样的组织体系，塑造哪些有战斗性的群众组织。无产阶级的策略应该回答，面对反动统治，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开展何种类型的斗争，在斗争中坚持哪些原则，实现哪些群体的联合和扩大。例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对1905年革命形势，列宁写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策略，批判了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策略。孟什维克主张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应该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跟随就行；列宁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必须掌握领导权，这是党的核心政治策略。孟什维克看不起农民，认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而列宁认为农民才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以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孟什维克惧怕革命，不愿意发动人民武装起义；列宁号召在1905年革命中举行人民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是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手段，核心是工农必须联合起来去夺权。这才是策略层面的讨论。

融工战略和策略也是如此。融工战略应着眼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在当前和未来不同阶段上应实现什么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重点完成何种任务，是通过沿海代工厂的工人去实现目标与任务，还是通过重工业工人去实现。融工策略应着眼于当前工人的不同部分，明确先做哪部分工人的工作打开缺口，利用何种形式的组织，促成何种形式的斗争，如何争取到斗争胜利。很可惜，在大群老管理《融工的战略与策略——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谋略》完全没有涉及任何战略与策略。在通篇空洞的、没头苍蝇式的写作中，只能找出如下苍白的语句——“熟人网络”发展壮大才是马列毛主义的融工战略，不要寄希望于合法组织形式——除了这些话，就都是口号式的东西了，与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毫无关系。

大群老管理靠“熟人网络”包打天下，别人一问他们怎么干革命，他们就回答“熟人网络”。但他们搞了十几年，搞出什么“熟人网络”来了吗？完全没有！他们的行动能力，连工联主义者都不如，“熟人网络”不过也是痛快痛快嘴。我们假定熟人网络就是正确的策略，那熟人网络是先天存在的吗？是沈梦雨一进入工厂就有的吗？是大群老管理提前安排好的吗？不是的！熟人网络是靠正确的群众工作方法发现出来的，靠正确的群众工作方法培育出来的。根本仍在于正确的群众工作方法是什么，而不是空喊熟人网络。有很多工厂里工人和工人之间是比较疏离的，需要先进分子进去以后通过开展各类群众活动，促进工人之间相互交流，逐步形成工人认可的新社会关系。例如《韩国工人》中七八十年代入厂的学卒，经常邀请工人同伴到住所，为她们做炒年糕和其他喜欢吃的东西，在共同的生活和交流中获得了工人的信任，促进了工人团结和组织发展，学卒也成为工会代表。再例如沈梦雨，刚到工厂的时候她有什么熟人网络吗？没有，她是靠自己跟工人一样工作、帮助和团结工友取得信任的，最后员工才推选她为谈判代表。工厂里的工人流动性很大，实际上工人内部的联系是很弱的，大群老管理寄希望于一个先天存在的很紧密的熟人网络，以为打入这个熟人网络就可以搞工人运动了，真无异于痴人说梦。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熟人网络是要自己去开发的。

大群老管理从佳士事件中得来教训，一遍遍重复“与群众相结合决不能依赖于任何合法的、公开的、改良的形式”，除此以外，无法给马列毛主义者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即便这一点也是存在诸多疑点的。从历史上看，国民党时期不会比现在更民主，那时如果谁有左翼色彩，搞不好就掉脑袋了，但即便如此，地下党仍然能够充分利用各种公开合法和灰色半地下的组织形式，团结很多群众，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当中持续不断发展党组织。以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为例，1946年5月，地下党发动了群众性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大规模斗争，在运动中锻炼培养了一大批新的积极分子，到1946年底，党员人数从抗战胜利初期的2000多人发展到5000人左右。1947年开展反美抗暴斗争，上海党组织把一部分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吸收进了党组织。1948年上海地下党又领导了同济斗争、申九斗争、银行行员罢工以及“六二八”斗争，涉及学生、工人、店职员、教师等各个层面。通过领导广泛的群众斗争，党员队伍得到了一定的壮大，截至1948年8月，上海党员人数达到8500名左右。从现实来看，卡车司机能组建全国性的工会，本田工人在2010年运动后一段时期内能将敢于斗争的工友选为工会代表，沈梦雨能在工厂中当选劳资谈判代表，本身就说明合法的、公开的、改良的形式有可以利用的空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依赖”这些组织，问题在于通过怎样的方式，公开的和灰色的组织如何联合使用，最终形成工人中的群众组织和核心组织。这些问题大群老管理完全无法回答，让他们回答也确实难为他们了，因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自己很骄傲的说自己的组织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但仍无法回答这些基本问题，也足以反映这个组织是何种成色。

大群老管理还热衷于喊“夺权”的口号，把别人一棍子打为“只想维权的工联主义”。谁要探索工人工作，谁就“只想维权不想夺权”——这是大群老管理的一贯伎俩。他们不污蔑和歪曲别人，就没法输出那些低级的口号。还有他们所谓的“代表会议”策略，拿某个国企（郑州造纸厂）斗争案例得出的方法，作为药方送给外资、民营企业的工人使用，幻想着哪家工厂发生斗争了，马上大群老管理就神兵天降，带领工人占厂、建立职代会；然后一家工厂一家工厂夺权，最后发展到全国。大群老管理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这么搞的。很可惜，这种看法只能暴露出老管理到底有多么脱离群众，以工劳快讯报道的近期工人斗争为例，好多工厂发工资时候调低工价引发工人罢工，这时候如果老管理们到现场让工人占厂、夺权，即便不演变成新的“佳士”，最好的结果也是工人们让大群老管理滚蛋。

进厂后靠熟人网络发展地下网络，然后在斗争的时候搞职代会，形成工厂权利机构，这就是大群老管理虚幻的融工策略。与其说虚幻，不如说白日做梦——大群老管理何以做了十几年的白日梦，现在还要继续做下去，还要带着新人们一起去做白日梦呢？根源在于他们脱离群众，而他们自己又不想承认自己脱离群众，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他们俨然已经是革命领袖，哪有革命领袖脱离群众的？所以不懂装懂，编也要编一套《融工的战略与策略》出来。最近大群老管理怕被人揭穿拒绝调研、脱离群众的本色，拼命在时评频道发《融工的战略与策略——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谋略》《无产阶级革命与融工问题》类似文章，对这些文章，大家看看就图一乐吧，别当真，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写的是真的。

线上与线下工作结合是左派线上组织的必由之路

汕尾等地的美团工人罢工，又把这样的事实摆在了我们面前：当前左派力量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现实形势的发展，以至于几乎所有左派组织对于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工人运动是无能为力的。当前几乎所有的左派组织仍旧停留在线上工作的地步，做着例如时事报道以及撰写时评的文字工作，其工作范围非常受限。

诚然，当前左派的力量仍然处于发展早期。实力弱小、工作范围有限、组织能力，这些都是客观现实。不过，如果我们从线上的左派组织发展的角度进行观察，其实当前线上左派组织已经小有规模，地域分布也极为广泛。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志。然而，线上左派组织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参差不齐，组织水平较低也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线上的活动，仅仅做一些有限的组织的尝试，那么我们就仍然离线下现实的斗争相差很远。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我们想要学习游泳，但是又不下水学习游泳，而是在陆地上看游泳的专业书籍、练习各种泳姿，那么这样的努力再多作用都是有限的。目前大家如果有参与过一些线上工作的经验，一定会有这样相同的感受。

目前，有一种流行甚广的思路是在线上进行组织，等线上组织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去开展线下工作。这种思路有一定道理，但是仍然面临几个严重的问题：

1、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再去开展线下工作呢？是人数达到一定规模，还是线上组织成员的能力达到一定层次？这个问题是当前流行的思路无法给出解答的。当我们抱着求知的态度询问其怎么办时，得到的答案总是：“再等等线上组织的扩大再说罢”，如此模棱两可的答案。

2、即使线上组织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理想的程度，可是如果要走到线下开展工作，根据当前流行的思路，是需要进行多个成员组织起来，以团队的形式开展工作。但是如此巨量的线上人员，要想能够分成此类复数个工作团队进行工作，仍然面临着如何开展第一个进行线下团队工作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同时开展多个团队进行线下工作的问题。对于此类如何开始的问题，当前流行的思路依旧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而是支支吾吾地讲着：“也许类似沈梦雨硕士的做法”那样含糊不清的话语。

3、当前流行的思路的可行性是值得怀疑的，尽管提出这种思路的人用了大量大量的篇幅，文笔甚至历史久远（10年以上）的文章来为他们的思路背书。然而，目前我们仍旧没有看到任何线下实际经验的反馈，来对此类流行思路进行验证。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此类流行思路的客观性，于实际的适配性，适应性等提出质疑。是否一切真的像他们所宣传的那样，例如可以在“一个工厂扎根，工作上10年8年，建立起深厚的人际关系网络”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工厂又一个工厂的夺取”。对此，我们似乎并没有看见任何实践的经验来证实此种流行10年已久的思路的可行性与适应性。

我们自己对于线上和线下工作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反思。我们认为，单纯进行线上组织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线上工作必须与线下工作结合起来。我们应当鼓励各位有条件的同志开展线下工作的探索，而不是偏安于线上一隅，理由如下：

第一，从线上工作的主体和对象来看，线上工作的主体是具有一定的空闲时间和有能力翻墙的人群。其中，较大比例的同志是知识分子，甚至知识分子中，学生的比例很高，而工人很少；相对应的，线上工作的对象由于传播渠道的限制，也主要面向知识分子（且以学生为主），受影响的工人很少。这样来看，线上的工作主体是知识分子，对象也主要是知识分子，总体来说还是左翼思想在知识分子中传播的重要途径。

但是，这种传播也囿于线上的特点而传播能力有限，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域。即使来自于同一城市都可能相隔很远，而且即使线上比较熟悉了也缺乏足够的信任。最终这样的传播只是形成了一个孤点，很难连缀成线乃至成片。

第二，从线上工作的内容来看，不管是群聊天、写时评还是组织学习讨论，都主要是以口头上的批判为主，最终内容也只是在线上扩散，没有形成现实的力量。

第三，基于线上的联系仍然是相对松散的，基于线下的联系要更为紧密一些，尤其是在较长期的斗争中共同战斗后，信任度和联系的密切程度也较线上要高很多。

当然，线上工作也有自身的优点，例如目前左群内大家都是对于社会性质、对于左派的理想有一定了解和追求的。而线下开展工作往往会面对无甚政治意识的群众。想要从中迅速筛选出具有左派倾向的同学/工人往往没有线上那么容易。同时线下的扩散往往是通过熟人网络进行，而这种扩散的范围、速度也要比线上要差很多。下面的表格，是我们对线上以及线下工作的一个概括性质的总结：

	线上	线下
对象	知识分子为主	知识分子和工人
传播特点	孤立点	由点成片
工作内容	批判的武器	既可以有批判的武器，也可以有武器的批判（结合线下的斗争）
工作难度	容易，左群内具备基本立场和工作意愿的同志容易筛选出来	相对较难，多数是政治意识不成熟的群众，少数人才具备左翼倾向，但是随着具体的宣传和斗争的进行可能会变得容易
传播速度	快	慢
传播范围	广	狭窄
联系程度	松散	相对紧密

我们经过反复思考认为，线上工作一定要和线下工作结合起来，扬长避短，互相配合，从而为迅速发展的形势培养左派力量。

线上的特点是已经形成了较好的左派氛围，让左派聚集起来，初步组织起来，深入学习理论和开展一些初步的组织实践，培养能力，为线下做准备。

在形成初步的线上组织后，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同志开展线下工作的积极探索，不管是学生工作还是融工工作。如果不去做线下工作，只是一味的在线上发展，一方面要达到能够由点成片的时间过长，效率不够；另一方面是线上发展与线下实践有所脱离，应当尽早用线下实践去指导和检验线上工作成果。这样在线下的学生工作中，我们便有可能建立起来一个又一个秘密的学生小组，构成未来党组织的原型和基础。

当然，线下工作的开展需要克服一些障碍，核心问题在于工作空间有多大，目前这个问题在左派内部争议较大。我们的回答是：办法总比困难多。以学生工作为例，公开的左派宣传甚至直接挑衅当局的行为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寻找到具有左派倾向的同志，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地下的读书会、学习小组的方式却是具有很高可行性的。对于这种线下工作的活动空间，我们认为应该以一种积极的态度进行勇敢的探索。当我们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便可以结合线上的传播优势，使得线上的同志们广泛开展线下的学生工作。这样线上工作与线下工作将互相联动和互相促进，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而至于工人的工作的情况也是类似，我们鼓励大家从跟工人聊家常交朋友开始，或者是调研开始，逐渐接近工人，有条件的可以进厂打工，进行深入的融工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宣传工作。

当然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还涉及到个人还是组织开展工作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绝对的，组织总是从个人开始的，线下开始做工作寻找到同志后也可以形成小的松散的组织，线下做工作也可以形成更紧密一些的组织，这些组织规模各异、组织程度、紧密程度不同，但在逐渐的磨合和实践中，会逐渐成长，逐渐掌握做工作的正确方法，逐渐团结更多的同志壮大自己，逐渐扩大规模，一定会成为未来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乃至先锋队的种子。刻意强调某一个组织或者某一条线的组织都是片面的。单纯寄希望于线上工作培育组织，不去结合线下，可能效果也是不尽如人意的。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线下发展应与线上发展工作结合起来，以线下工作为核心，进行线上工作的建设。线下的地下组织与线上组织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将现有的左翼工作连点成面成片，到处开花，令得线下的地下小组能够具备现实的力量，从而成为未来先锋队的火种。

这样的线上与线下秘密工作小组的结合与建设，也许是当前中国严峻的革命情势下，一条可能的路径。最后，我们要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三部分 社会社评

我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我国人民群众生活脱节，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着各种反动政策，残酷的剥削、压迫着我国人民群众。并且还利用各种反动舆论或文艺作品来灌输各种反动思想给我国无产阶级及更广大人民群众，以此达到维护自身反动意识形态进而维护统治的目的。我们应该揭穿他们的鬼把戏，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我们在这部分集中了一些相关文章及评语，供大家参考。

评我国农业领域中的最新变动

RSF 编辑部

一. 农管的出现

“农管”的出现是我国农业领域中最新的重要变动之一，这个职业在我国农村的出现瞬间就制造了一大堆矛盾。

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召开了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建设推进工作视频会，启动部署2023年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稳粮保供”专项行动。针对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和作用发挥等问题，记者采访了农业农村部法规司有关负责人。

问：请问为什么要成立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答：农业领域执法监管一直都是农业部门的职责任务。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部门职能加快转变，执法监管任务不断增加，涵盖了种子、农药、兽药、饲料、农机、动植物检疫防疫、农产品质量安全、渔政等多个领域，多年来，地方尤其是县级农业部门内部多头分散执法，影响执法效果。

为适应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法治政府、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对加强农业执法的要求，提高执法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一些地方也先后在农业部门内部开展了综合执法试点，取得了一定效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依法行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综合执法，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整合组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文化市场、市场监管5支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农业农村部指导地方，按照一个部门原则上一支执法队伍的要求，将原分散在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内设机构和所属单位的行政执法职能整合起来，组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以农业农村部门的名义统一执法。除沿海、内陆大江大湖和边境交界等少数渔业执法任务较重的地方，继续在农业农村部门内设置相对独立的渔政执法队伍外，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基本实现一支队伍执法。按照中央的要求，这支队伍的编制都来源于原来承担执法职责的机构和单位。截至2022年底，市县两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已按要求组建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按政府官方的解释，这支新的行政执法队伍是由过去分散的地方行政执法队伍组成的。也就是说在过去，农村就有了一些相同性质的队伍在进行着类似的零星的活动。

问：近期网络上有人把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称作“农管”，说“农管”对农村的事什么都管。请问农业综合执法队伍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

答：我们也关注到了有关信息。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并不是什么都管，而是有明确的执法边界的。经国务院同意，我们印发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各地也结合实际制定了相应的目录，对执法事项实行清单管理，要求“法无授权不可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职责使命主要是打击假冒伪劣种子、农药、兽药等侵

农害农违法行为，不会干扰农民正常生产生活。网上有的帖子提到的“禁止房前屋后种瓜种菜”等，并不属于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范围。

按照法定职责，各级执法队伍紧盯春耕备耕、三夏生产、秋冬种等重点时点，围绕品种权保护、农资质量、农产品质量安全、动植物检疫等重点领域、重点专项加大执法力度，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充分发挥了执法的护农促振兴作用。如山东省一网打掉100余家假兽药生产经营企业，抓获涉案人员45人，涉案金额达1.2亿元；四川查获一个向全国24个省份销售假农药的特大制售假药团伙，捣毁制假窝点8个。据统计，2020—2022年，全国各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累计查办各类违法案件30.47万件，调处纠纷1.89万件，挽回经济损失14.96亿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关于这支队伍性质的解释，在官方冠冕堂皇的回答中，是看不到关于负面的情况的，好像这的确是一支为了农民们的利益而服务的队伍。但实际情况显然不仅是这样。这支队伍除了被我国许多群众立即起了一个“农管”的称呼。而这个称呼则来源于有一些同性质的“城管”，但“城管”对于我国部分群众而言来也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城管在现在则完全成为了管理、监督小商贩等我国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常备军，并提供了剥削、压迫、镇压的各种可能和类似的自发行动。那么农管对于我国农民来说是否也具有相同的性质呢？

哥的鱼塘又多个农管管理，农管已经去过3次了，他们要求，鱼塘四周围栏不许种玉米、豆角，说是有碍观瞻，但可以种黄瓜。农管还要求把鱼塘的树修建。

我哥说，鱼塘有正规手续，每年在鱼塘水面和围栏间种什么都允许，种玉米、豆角也行，我又不是在围栏外种植有何不可。农管说，秋天叶子黄了不好看。

我哥说，农家菜园种农作物，农业部门允许，我的鱼塘和菜园在一起，种豆角茄子辣椒每年都种，今年也种，不种我吃啥。农管说，这是两码事，不让种就是。

—微博网友

农管一出现立马就开始干涉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直接威胁农民的直接经济收入手段。在许多地方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农管们持着防爆盾进农田拔庄稼的画面。而许多相关的负面消息很快就在墙内被消灭了，但我们还可以在墙外中看到不少这样的信息和视频。

如在东莞民田，农管去一养鱼的养殖户那里拆除房屋，此农户50亩的田，不准放一个桶，连鸡笼也都拆了，下雨天小鸡崽无处躲雨，被淋生病成病鸡而快要死掉，鱼因为没有氧气机器也死了。5月3日福建古田县大甲镇昆源村，农民的猪场被农管拆除。5月3日河南农管开始大面积拆除农户的牛棚、羊圈、猪圈。5月5日漳州农管破坏水管，不让农民自动喷灌，严禁铺设水路灌溉农田，只能挑水。

在许多网上流传的视频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许多农管人员砍倒农民的树，持防暴盾牌进入菜园，拔农民的蔬菜，农民与农管发生冲突的现象。

二. 农管的部分目的和农村产权流转

我们在来研究下农管的目的。

养殖户：农管不是来保护农民

四川绵竹养殖户森先生对记者说，他也听说农管在行动：“现在就是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太黑了。现在农管权力已经很大了。他们农管一下乡，就把老百姓整惨了。现在我们这里还没有接到新要求。现在他们的权力不是所说的打击侵农害农，保护农民。”

评论人士蔡慎坤说，中国要开展“稳粮保供”专项行动，以及进行农村产权流转试点工作，必须依靠农管队伍协助完成：“必须要依靠所谓的农管进到千家万户、进到田间地头，不出现问题之后，农民他不干，很多乡镇干部也不愿意去抛头露面，去干一些打砸抢的事情。农管应运而生就像当年的城管一样。”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一批城管正在蔬菜地，拔除农民种植的蔬菜，有村民被按倒在田间。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当局回应称的该队伍主要打击“侵农害农”违法行为，不会干扰农民正常生产生活。事实上这支被人称为“农管”的队伍则是专门进行“侵农害农”的队伍，还具备着完成农村产权流转试点工作的任务，所以我们还要看看这个所谓的“农村产权流转”的性质，在我国农业农村部在2021年颁布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端倪。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以下简称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保障流转当事人合法权益，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

第三条 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损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不得改变承包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及其农业用途，确保农地农用，优先用于粮食生产，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

第四条 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把握好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流转规模应当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鼓励各地建立多种形式的土地经营权流转风险防范和保障机制。

第五条 农业农村部负责全国土地经营权流转及流转合同管理的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依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经营权流转及流转合同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经营权流转及流转合同管理。

第二章 流转当事人

第六条 承包方在承包期限内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经营权是否流转，以及流转对象、方式、期限等。

第七条 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

第八条 承包方自愿委托发包方、中介组织或者他人流转其土地经营权的，应当由承包方出具流转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的事项、权限和期限等，并由委托人和受托人签字或者盖章。

没有承包方的书面委托，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承包方的土地经营权。

第九条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应当为具有农业经营能力或者资质的组织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

第十条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方式、期限、价款和具体条件，由流转双方平等协商确定。流转期限届满后，受让方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续约的权利。

第十一条 受让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土地，禁止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禁止闲置、荒芜耕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第十二条 受让方将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再流转以及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的，应当事先取得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发包方备案。

第十三条 经承包方同意，受让方依法投资改良土壤，建设农业生产附属、配套设施，及农业生产中直接用于作物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设施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到期或者未到期由承包方依法提前收回承包土地时，受让方有权获得合理补偿。具体补偿办法可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中约定或者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三章 流转方式

第十四条 承包方可以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

出租（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经营权，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入股，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经营权作价出资，成为公司、合作经济组织等股东或者成员，并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第十五条 承包方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将土地经营权部分或者全部流转的，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变。

第十六条 承包方自愿将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可以采取优先股等方式降低承包方风险。公司解散时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方。

第五章 流转管理

第二十一条 发包方对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受让方再流转土地经营权以及承包方、受让方利用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的，应当办理备案，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

第二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向达成流转意向的双方提供统一文本格式的流转合同，并指导签订。流转合同中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第二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台账，及时准确记载流转情况。

第二十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对土地经营权流转有关文件、资料及流转合同等进行归档并妥善保管。

第二十五条 鼓励各地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或者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业务指导，督促其建立健全运行规则，规范开展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咨询、信息发布、合同签订、交易鉴证、权益评估、融资担保、档案管理等服务。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应当按照统一标准和技术规范建立国家、省、市、县等互联互通的农村土地承包信息应用平台，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网签制度，提升土地经营权流转规范化、信息化管理水平。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工作的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开展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指导和管理工作的。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服务，鼓励受让方发展粮食生产；鼓励和引导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包括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等）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自然经济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因素，引导受让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防止垒大户。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我们也可以看看关于这个政策的一些其他评价。

中国农业农村部等 11 个部门发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今明两年，试点地区探索农村产权规范化流转交易机制，构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和监管机制。另外，近期各地农管启动“稳粮保供”行动，据称是为了确保这次的试点顺利进行。该方案涉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可能发生变化。

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据农业农村部网站公布的《方案》显示，试点期为两年，由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试点，探索农村产权规范化流转交易机制以及“发挥政府在规划引领、运行监管、政策支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争取试点地区逐步构建起比较健全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和符合行业发展特点的监管机制。”

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山东胶州居民张先生本周五（21日）告诉本台，他最近回到农村得知，农民种地需要证件：“我回村里，街坊们反映，现在要持证种地了。我在农村的亲戚朋友外出打工，把家里的地委托亲戚种植，也没有什么合同，我什么时候不打工了，回农村，你马上还给我种。现在不可以了，因为现在国家粮食危机很大了。”

试点方案要求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完善交易规则以及完善各品种交易规则，规范交易申请、委托受理、信息公告、受让受理、组织交易、交易中（终）止、组织签约、交易（合同）鉴证、档案管理等程序，确保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进行。

该方案涉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民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可能发生变化。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本周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此次试点规模之大实属罕见：“在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下一步把整个农村的土地，继‘包产到户’之后，再来一次大的土地变革。我觉得值得观察。现在农管开始执法，我觉得跟下一步土地流转、或者是没收并重新分配土地有关。”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启动部署 2023 年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稳粮保供”专项行动，各地成立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官方的解释是：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职责使命主要是打击假冒伪劣种子、农药、兽药等侵农害农违法行为，不会干扰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但据网易和新浪微博周三（19 日）消息，河南沁阳市农管以“生猪未检疫”为由，强行将养殖户的两车生猪拉去屠宰场。在猪肉卖完后，养殖户不但没有收到钱，连车也被扣留。对此，有网民留言写道，请问河南沁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谁在侵农害农？还有网民说，这是新时代新鬼子。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我们可以从中间发现几个明显的特征，要从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中分离出实际使用的“经营权”，要把“经营权”给流转出去进行交易，然后给予农民一些补偿利益，实际上这是鼓励大资本兼并土地的政策。过去的承包权的实质在今天有要被分离和取缔的危险，就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时修正主义份子用承包权来分离了集体的土地使用权一样，都是进一步分化农村、照顾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的政策。修正主义份子今天开始玩弄和历史上相似的把戏要来进一步的剥削我国农民。如果这个政策真的十分美妙就不会引起农民们频繁的反抗了。虽然大部分“农民”（就广义的农村户口而言），由于其家庭土地稀少或者没有土地，故早就放弃了以务农为生，转而靠进城务工。但显然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留在了农村，他们则是我国最后的、真正意义上的、狭隘意义上的农民，当然这种农民他也是劳动者，虽然带有一些私有的性质，但今天也快要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给夺走了。

而要设立专门的队伍来推动这个工作，并使它不得不具有一定的镇压能力。“农管”与农民们的矛盾便是这个政策实际性质的最好代表。关于“农管”我们再看看这支队伍的规模。

此前在 2022 年 4 月 29 日，湖北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着装启动仪式在省农业农村厅举行。报道称，湖北省 5000 多名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当日换上新装。2021 年 8 月，湖北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正式挂牌成立，2022 年以来，湖北省 5000 多名农业执法人员先后开展了农资打假“绿剑行动”、渔政执法“亮剑行动”，累计办理案件 3179 件，挽回经济损失 3414 万元。

—《新华网》

目前，全国已经成立 2564 个农业综合执法机构，在编的执法人员超过 8.2 万人。

—《搜狐新闻》

就规模而言，仅在编的农管就有了 8.2 万人，在一些省份一般有几千人不等的农管。这对于我国上亿的农业就业人口来说自然是不多的，对于大部分地区或大部分农民来说这还会是一种不太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不多必然要随着剥削压迫的需要而不断增加，就和我国城管的数

量实际上已达百万的一样。毕竟这支“农管”队伍从成立的开始就是一支实质上的劫掠我国农民、镇压我国农民的常备军，就和我国“城管”实际上是管理和提供镇压我国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条件的常备军性质类似，并且在其他方面实际上还要更过分一些，至少这些小资产阶级对自己的资产的所有权至少还能存在。

可见“农管”完全不是用来助农的，否则为什么还要装备起防爆盾来对付农民呢？在林芝市农业农村局采购执法装备的公告中发现，在采购列表中包含了“暗访取证设备，信号屏蔽器，防刺背心，电警棍，夜视仪”等装备，可谓是准备充分，一般的、单个的农民自然无力对抗这套设备。

所谓的双方自愿的合法流转在实际流转执行过程早已变成了地方政府抢劫的合法依据。在5月6日广州番禺石基前锋村，便出现了政府强制征收土地，征收的地一亩地补偿6万块，村民抗议、被镇长带暴力机关强行抓走的现象。可见这种流转在实际情况中对农民来说已经不是自由的了（就算能做到自由交易的实际上也是大资本兼并农民土地）。

就生产关系来说，我国的农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只拥有某种程度的使用权，“承包”就是这样的性质，土地的所有权名义上集中在国家手中。可以说我国的农民从生产关系的意义上来说，也都是农奴。这种情况自然是我国资本主义复辟所导致的。在革命年代，我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归农民们自己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而这种所有权是农民自己所决定和共同享用的。而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修正主义份子则用“承包制”实际上的把这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分离了，把使用权分离了开来，并把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权名义上过渡到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之下。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私人承包使用的现象。实际上使我国农民变成了官僚们集体的农奴，使我国农业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资产。这是对我国农民赤裸裸的欺骗。

我国的无产阶级主要是我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奴隶，而我国的这部分农民也成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农奴。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们付出了很多，人民公社解体后导致的大量农民无以谋生，他们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农村中赶到城镇中去劳动，可城市中也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农民工是我国无产阶级一个重要部分（在改革开放早期甚至是主要的部分，直到我国城市人口超越了农村），他们的劳动为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养料，为我国发展中的各类资产阶级主要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积累起了财富。

而今天，我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要进行一次类似的骗局。政府所谓的“法无授权不可为”和“不会干扰农民正常生产生活”一开始就变成了空话，现实是农管的活动处处超过法律的规定或者说法律的解释权在农管手里，并且把干扰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当作了其工作主要内容。“农管”对于我国农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灾害。“试点”的推行这种经营权流转，实际上就是要对农民们个个击破，官僚们要先打击典型然后就要推广进行劫掠所有的农民。

三. 退林还耕

除此之外，我国农业领域最近的新变动中还不止“农管”这一项。还有最近正在轰轰烈烈展开中的“退林还耕”运动。

“退林还耕”成官吏政治任务 天府造价百亿绿道被推平

成都当局近期铲平耗资数百亿元建立的城市绿化带，打算在三年内打造10万亩农田。有网友计算10万亩水稻一年收成就约7700万元，而被推平的绿道已投入三百多亿元。批评当局算政治帐，不计经济后果。在福建，有农民种植的70亩花地被强行铲平，还有竹子被砍。

中国各地近期展开一场以农村为主，被称为“新版大跃进”的运动，其中“退林还耕”已成为各地官员的政治任务和“重中之重”，地方官员在农管队伍的协助下，走到田间地头将农民种植的非粮食类植物强行铲平。在四川成都，当局正在铲平精心打造、耗资数百亿元建立的绿化带天府绿道，力争三年内建立10万亩农田。当地居民童先生本周五（28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各地政府都在进行“退林还耕”运动，民间的不满情绪高涨。他说，当局此举与粮食危机及局势紧张有关：“现在可能是因为台海局势紧张或者各种不稳定因素叠加，或是说是危机，政治安全、国家安全上的事，国家有备战备荒的准备。现在清查基本农田是否得到了有效的保障，通过农管、通过行政渠道加大它的查处力度。”

推平耗资数百亿的城市绿道改为粮田

童先生说，当局以天府绿道部分范围占用了基本农田为由，将在三年内将其建成基本农田。不过，成都网民从经济角度得出的结论是，成都市修起环城100公里的生态公园，共串联了121个公园，造价人民币341亿。按照打造10万亩水稻田最高收入计算，一年收入为7700万。换言之，341亿元的绿道成本，需要10万亩水稻田442.8年的收入方可平账。

有网友留言指责当局反复“折腾”，“20年前，根据‘退耕还林’要求，成都投入341亿元，建成世界最大的环城公园，现在‘退林还耕’，数百亿元付诸东流，那是纳税人的辛苦钱”，“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等。

对此，四川省国土资源系统的相关知情人士对大陆记者说，坚守耕地底线是当前自然资源系统内一项重大工作，目前各地对于已经建成的公共设施进行“纠偏”拆除，是保护耕地工作的具体执行。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成都天府绿道号称世界最大的绿道系统：“现在要退林还耕的是环城的100公里，而且部分绿道去年刚投入使用，今年推土机又来了，把公园改成田地。那么多钱的投入，那都是纳税人的钱啊！这就像大跃进大炼钢铁那样，结果什么钢也没炼出来。那时候的遭遇，结果是饿死几千万农民。”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虽然在本文在最后出现了高瑜等自由派知识份子常常具有的不能理解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本质阶级区别的现象，并在报道今天现实的同时还要对过去完全不能真正了解的事实进行顺便歪曲的误解说辞，但这些对现状的采访还对我们还是有参考意义的。

退林还耕强制推平农民承包地

中国各地农村自今年初就已启动“退林还耕”，要求农民将种植经济作物的耕地改种粮食。进入四月，当局更是出动农管队伍，在警察的协助下，以武力对待农民。4月23日，广西南宁，警察和农管队铲除六千余亩烟叶，26日浙江乐平，一农户在视频中述说自家三年前种植的竹子被砍：“唉，这么好的竹园子，辛辛苦苦种了三年，这么好的竹子，要砍下去。政府现在说要改农田，临时下的通知。”

在福建漳州某村村民杨先生和另外几个村民种植水仙花，近日接到通知，称耕地不得种花卉，只能种粮食。当地人说，政府经杨先生等村民同意，强行将70亩水仙花地推平。杨先生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此次“退林还耕”意味着中国政府执行了20多年的政策终止。中国官媒近期频繁发文强调要“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在为数年后，可能面对的粮食封锁或地区性战争做准备。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退林还耕”是我国目前一个重要的农业变动，农管的作用在这场运动中也体现了出来，不仅仅只是在成都，在浙江嘉兴、广西、广东等地都有大规模运动的例子，可以说这个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我们在各个城市都能看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政府控制的土地中，也出现在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中。要求消灭经济作物和林区，拿来扩大粮食产量。这对于粮食自给率极高的我国来说，这又不得不和国际上正在不断发展的世界粮食危机和战争的危机联系在一起，不得不和中美对抗和台海危机联系在一起。我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于战争的准备可谓是面面俱到，不仅是在工业领域、军事领域，在农业领域也开始大展动作了。但这必然只会引起我国被统治阶级更大范围的反抗。

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退林还耕”已经使得从打击一般农民，发展到了也打击收入较丰富的农民身上，使他们的劳动大大贬值。从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上开始向下滑落。

四. 农业变化的总面貌和斗争号召

那么我国农业中的变动的整体面貌我们已经能够大致确定了：

1. 首先，我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建立了一支管理、监督农民的常备军并为剥削、压迫、镇压农民提供了条件。这支常备军由农业农村部直接负责。这支部队虽然规模还较小，但他必然随着对农民剥削压迫需求的增加而不断扩大规模。
2. 要开始所谓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实际上是要实质消灭我国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剥夺农民们的土地。这不得不又要在农村中产生出大量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
3. 要进行“退林还耕”的运动，以预备国内或国际上战争和粮食的危机。实际上把更多的农民拉入到了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打击的范围内，使农村中较富裕的一批小资产阶级劳动者也被深刻改变。

我国农民们今天完全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们集体的奴隶，他们为我国资产阶级的工业发展付出了无数的血汗，今天还要被他们抢走仅剩的一点财产。我们号召农民们要团结起来对抗农管，对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统治，要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我国农民们依然是我国无产阶级的重要盟友和共命运的群体。

评汕尾外卖骑士罢工事件

RSF 编辑部

一. 事件本身

4月19日，广东汕尾市的美团骑手们集体“罢工”。事件直接原因则是因为骑手日常的补贴被取消。

通知：

根据本公司发展需求，能高效的完成美团总部的考核要求，现针对配送部骑手部分福利待遇进行以下调整：

全职骑手线下全勤奖更改为线上 APP 签到奖，所有相关考核制度以 APP 所示为准，该项奖励变更为 100 元/月，同时取消车补、油补及话补。

以上待遇更改与于 2023 年 4 月份开始生效执行，请知悉！

一配送部

据网络有上已有的消息判断，事发的两日内当地及广东部分地区下中到大雨，而外卖平台取消了多项补贴，这自然对于当地的外卖员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汕尾的美团外卖骑手们集体不上线接单，而平台却对不上线的骑手则进行每天扣 50 元的操作。并且骑手每单早已被压到了只有 3.8 元左右，这些原因都导致了潮汕美团骑手们罢工的继续。

我们也可以看看当地骑手们的看法。

多个[网传视频](#)显示，美团骑手罢工后，许多人闲坐在电瓶车上聊天、聚在公园玩手机，甚至沿河坐着钓鱼。28 岁的骑手陈先生向记者介绍，大部分骑手在本地有住所，可以接受没有收入“躺平”一段时间，但也有家庭较困难的骑手，为维持生计而接其他平台的跑腿单。

骑手们对罢工总人数说法不一。陈先生称有 700 多名骑手罢工，劳工媒体“[工劳小报](#)”称有 100-500 名，也有[自媒体](#)现场采访称有一两百人。NGOCN 无法准确核实罢工具体人数，但上百人的罢工规模近年来在中国并不多见。

陈先生称，美团为应对罢工，从梅州、汕头、河源等周边城市紧急招募了上百名外卖员，并用大货车运送电瓶车到汕尾。[网传微信截图显示](#)，美团为派遣骑手提供 200 元/天的保底收入、近三倍的配送单价，并包吃包住。

招募外地骑手的消息在抖音等社交网站上引发众怒。有人指责派遣骑手“背刺”，并号召本地骑手扎车胎、锁车、扔餐，向交警举报逆行和改装车。劳工自媒体“[骑手地带](#)”称，

美团把骑手和平台的矛盾，转化为本地骑手和外地骑手的矛盾，“让骑手斗骑手”（此文已被微信屏蔽）。

[有外卖骑手分析](#)，美团宁愿以数倍成本调配骑手也拒绝提高本地骑手待遇，是因本地单价上涨后难以再压价，但派遣骑手是临时的，危机解除后即可解散。“骑手地带”评论称，美团担心汕尾骑手罢工成功而传导至其他城市，导致全国各地骑手纷纷效仿罢工，要求提高待遇。

实际上，派遣骑手并未如美团计划有效“支援汕尾”。陈先生称，这些外地骑手很少出来送单，大多住在酒店里，领200元/天的保底收入，也没有和本地骑手有太多冲突。此外，也鲜少有本地骑手趁此机会拼命接单。他称，“小城市，很多人之间比较熟悉，兄弟们比较团结”。

罢工一周后，美团做出退让，提出新的薪酬方案。陈先生称，美团宣布将恢复取消的多项补贴、增加五一假期的短期补贴、将基础单价从3.8元恢复到压价前的5元，并承诺建立和骑手的对话机制，不会乱出方案。当晚，外地骑手陆续撤离，部分本地骑手复工。

但许多骑手并不满意美团的承诺，认为这是“文字游戏”。陈先生称，单价越来越低、补贴说没就没了的情况并没有改变。他补充称，大家不相信美团能长期履行承诺，不知何时美团又会再次随意变更政策。

此外，美团出具了新的“升降机制”，鼓励留岗骑手，惩罚罢工骑手。据陈先生提供的美团汕尾分部《通告》，近三个月内工作时长、送单多、准时率和好评率高的骑手可“升级”，反之“降级”，而骑手评级会影响其接单和补贴单价。

陈先生称，许多骑手认为美团“拉拢一批，打倒一批”，目的是分化骑手，从而“更合理地压榨”。他补充称，许多罢工骑手已被美团强制删号了，无法再注册成为外卖骑手。

记者注意到，美团汕尾分部关于取消补贴和设置升降机制的通知公告，均无公司公章，落款为“配送部：章云龙”。陈先生解释，管理他们的是美团外包公司的站点，正式文件从来没有公章，“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一刀切”。

此次罢工爆发，缘起美团汕尾分部自4月1日起取消多项补贴，激化了骑手和平台间的矛盾。

陈先生称，美团取消了电瓶车补贴、话费补贴和全勤奖共350元/月，并将最高15元的远距离阶梯补贴统一降至5元左右。此外，美团提出严苛出勤标准，包括不出勤扣50元，三次出勤达不到8小时/20单则劝退。

美团取消补贴前，陈先生一个月跑900多单可以赚到5000多元。但补贴恢复后，他称现在每天只跑20单，完成平台的最低要求就下班，因为“送外卖已经赚不到钱了”。

美团官方从未对罢工做出任何回应。[经济观察网引述美团外卖客服回复称](#)，未接到有关汕尾骑手罢工的消息。目前相关词条于微博无法以标签方式搜索。

- 《中国数字时代》

可见压迫对于骑手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而面对本地骑手的集体罢工，美团更是以高单价加超时免责从外地紧急调派外卖员。我们可以看到，21日美团就开始从惠州、河源、梅州、陆丰、大鹏等抽调两百多名骑手过来，每名骑手更是每天补贴两百元外加十元一单并提供住宿的丰富条件来代替。

就连本地骑手也早已不相信美团能履行承诺，并认为资本家们随时都会再次变更政策加深剥削。骑手也能看出美团是“拉拢一批，打倒一批”，为了分化骑手，从而“更合理地压榨”。他补充称，许多罢工骑手已被美团强制删号了，无法再注册成为外卖骑手。

从经济条件上来说，这两百名骑手的劳动待遇已经不亚于正常情况下两千名骑手的待遇了。资本家此举自然不是钱多了做慈善，而是为了打击工人运动，迫使骑手们屈服、并分化本地的骑手的团结立场。

作为资方，美团也清楚它一旦妥协，未来就会有更多的妥协，只能以强装强硬的姿态来反击工人运动。如果劳动者们的斗争不能彻底而是被敌人分化了，如果劳动者们不能联合起来斗争自然容易失败，必须要联合起来对资本家重拳出击。

所以这种斗争就会有两种结果。要么是罢工的骑手们争取到了自己想要的福利待遇，要么是美团借助短期的“雇佣兵”等一系列手段粉碎了本地骑手们的维权运动，并最终巩固用低价换取本地外卖员劳动的特权，并在新的价格上有条件对骑手们发起新的攻击。我们需要引起重视！

二. 反动的呼吁和我们的口号

外卖骑手在我国规模不小，背后更是有着深刻的阶级因素。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在线外卖市场规模已达1万亿元，美团和饿了么合计市场占有率超90%。庞大的市场规模也使得外卖配送员这一职业飞速发展，据美团的财报显示，2022年，美团骑手的数量变成了624万，其中81.6%是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台一年新增骑手的人数达到了97万。饿了么2022年蓝骑士报告显示，有114万骑手在平台获得收入。

—《网经社》

骑手们大多来自我国的落后地区，他们能够更吃苦，是我国规模不小的外卖骑手群体的主力军。但与之相对应的，美团和饿了么却已在外卖行业建立起了垄断的优势。他们自然也要对骑手们使用这种优势。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在线外卖市场规模已达1万亿元，美团和饿了么合计市场占有率超90%。庞大的市场规模也使得外卖配送员这一职业飞速发展，据美团的财报显示，2022年，美团骑手的数量变成了624万，其中81.6%是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台一年新增骑手的人数达到了97万。饿了么2022年蓝骑士报告显示，有114万骑手在平台获得收入。

李旻律师认为，罢工事件反映了平台经济下的劳动者的弱势地位。资本的力量是巨大的，对于龙头平台企业来说，底层的劳动者的权益是经常被忽视的。对于众多骑手来说，与美团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如果要维权，则需要向第三方主张责任，维权成本过高。

— 《网经社》

可见，我国的知识分子们也都能认识到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和统治优势，他们也能发现劳动者的维权困难。虽然这种报道多少是关系劳动者现状了，但是《网经社》最后却对劳动者们和我国其他群众下了投降主义的呼吁，使得自己走到了反动的立场上去了。

李旻律师进而表示，这次事件仅仅通过骑手个人维权，是比较困难的，即使成功，也仅是个人的成功，无法有效的改善行业现状，解决平台经济下劳动者维权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加入才行。

董毅智律师建议，监管部门能够及早介入，协调双方的矛盾，更好稳定平台经济的发展，然后也是维护广大用户的利益。

事实上，对此，政府也在不断提出新的保障机制，不少地方也正在此方面做有益尝试

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针对外卖送餐员的劳动收入、劳动安全、食品安全、社会保障、从业环境、组织建设、矛盾处置七个方面提出要求，旨在保障外卖送餐员的合法权益。

202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再次就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对美团、饿了么、滴滴、曹操、达达、闪送、货拉拉、满帮、阿里巴巴、腾讯等11家头部平台企业联合开展行政指导。

会议强调，平台企业要全面准确理解政策要求，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深入了解劳动者诉求，加大对用工合作企业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监督力度，持续完善平台算法和劳动规则，健全企业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制度机制。

2023年4月，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杭州市商务局、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杭州市公安局举行《杭州市网络餐饮外卖配送监督管理办法》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

办法共二十八条，包括网络餐饮外卖配送的适用范围、概念定义、主体责任、监管职责等，同时明确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指导餐饮行业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促进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网络餐饮外卖配送行业的劳动保障权益维护工作；公安机关负责网络餐饮外卖配送活动的治安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网信、城市管理、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对网络餐饮外卖配送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四、尾声

汕尾美团骑手集体罢工事件反映了一些外卖平台在劳动关系、配送费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或许不仅仅局限于汕尾地区，也可能出现在其他城市。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外卖平台需要加强与骑手的沟通和合作，建立更加公正、有效的劳动关系，提高骑手的待遇和福利水平，只有平台和骑手形成和谐互利的关系，才能构建起真正的壁垒。

希望监管部门和国家机关能起作用，希望加强与骑手的沟通和合作，要和谐互利的解决这种问题。这实在让人笑掉大牙。先生们，你们要是真正怜悯工人的话，就不要用虚假的、注定不能实现的官话来欺骗工人们放弃斗争，如果工人放弃斗争而去相信和政府、资本家们和谐互利那么明天他们就要当更悲惨的奴隶了。工人不需要你们的幻想来使自己放弃斗争，工人们恰恰需要坚持斗争！

我们要清楚的注意到，罢工对于我国来说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来讲，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只有这种罢工数量变多且规模变大使，我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才能够得到最起码的维护。关于这一点许多墙内的左翼人士也能认识到。

比如说如这一次的罢工行动一般，当某地员工权益受损时，依旧可以通过短期调动外地外卖员来填补缺口。

而大家都是打工人，这么一做，平台就很轻松将其他地区的外卖员拉入了与本地外卖员的对抗中来。

毕竟“人口多，你不做有的是人做。”这也正是我国许多资本能够不严格执行劳动法的底气，然而其本质不仅仅是人口问题，而是马克思所提到的“失业储备军”。正是因为大家的生活都不好过，难以养家糊口了，给出一个压榨性很明显的合同，也有着人去抢，在这个合同上稍微给的多一点，想去做的人就更多了。

然而这样终究解决不了问题。

3. 工与谈判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罢工，尤其是集体性的罢工在我国现阶段是一个应当允许并且应当出现的形式。

然而，除了人口因素而外，不得不借助“罢工”来维权的原因还很复杂。

其中一个点便是：许多互联网平台作为某地经济发展的好帮手，为某地提供了诸多生活基础服务（支付、外卖等），政府为了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让渡部分权利给平台。

也正因此，在针对平台的问题上，尤其是小地方的政府，想要取得十足的成效和进展，难度很大。

而诉诸合理渠道的路径看似走不通之后，就充满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沟通途径的呼唤——比如这一次的罢工。

罢工的目的是为了毁灭经济吗？不是。

罢工的目无非就是为了让劳资双方重新获得一个平等谈判的机会，在沟通的过程中尽量达成一个双方满意的协议再出发。尤其是当其他合法的“平等谈判”的机会都处处充满了不平等的因素的时候，罢工就显得尤为宝贵。

在我国，大规模的罢工不常见，这与正式合同工如果想要罢工需要先申请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然而作为零工经济的外卖员却不受到这种掣肘，在维护自己权益的同时能够采取罢工的手段，毫无疑问，他们是值得敬佩的。

尤其是在我国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大，劳动市场一边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稀少，另一边又逮着上车的可劲压迫的今天，在我国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逐步走高的今天，在成都某吐槽放假加班，即便是谣言也已经全网热议的今天，种种复杂而艰辛的情绪，夹杂着对一个平等而美好的未来的期许，让我不由得对这些带头罢工的人致敬，无论是今天的外卖骑手，还是去年的富士康工人。

一个社会不能仅仅充斥着自上而下的话语，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声音，只有在这样的声音碰撞和交互中，才能进步。

—Sean ding 《知乎》

我们也能看到，罢工只是一个开始，它并不毁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相反是使得资本主义经济更健康的运行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必须从这种基本的斗争开始，使它规模巨大且越来越多并能够胜利时，我们就能很容易的走向更彻底的解放自己的斗争。我们相信只有斗争能够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只有斗争能够解放我们。

毫无疑问结果是支持我们的结论的。

“广东汕尾外卖骑手集体罢工一周后，美团宣布恢复骑手待遇。”

“4月26日宣布恢复骑手待遇。当晚，外地骑手陆续撤出，部分本地骑手复工。”

—《中国数字时代》

我们一定要抛弃、批判那种在一切工人运动事件初期就开始散播消极倾向和投降主义呼吁的东西，他们是维护资产阶级立场的投降者。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的言辞简直是最危险的蛊惑，一旦听信就要吃苦头。坚持斗争和广泛的联合则是我们胜利的依据。对此，我们口号是：联合起来、再联合起来，坚持用斗争维护自己的权利，用斗争解放自己。

第四部分 同志来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星火分散各地，但只有革命力量的集中才有革命事业的发展，我们意图推动这个集中和发展。这一部分文章是非我们编辑部创作的，直接向我们投稿的同志们的文章。我们精选其中质量较好，适合我们刊物主题的部分整编在了这一部分内。感谢同志们的投稿、支持。读者们也可以以此参考我国各地革命者的文章。

一些关于讽刺“左”的现象

自从央视发布了那一期关于“拉车老人”的视频后，视频中那一幕年迈老人拉着车，其右侧面驶过一辆保时捷的画面又成为了一大经典。有网友联想起中共官方宣传用的一句话“好好干，日子会甜起来的。”从而引发了一股“甜”潮。“甜”这个字，开始在各大有关劳动者的视频下面出现。六十岁的老人在公司上班，甜；外卖小哥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收入一百多元，甜；“广东流水线”一小时8元，“甜”！“甜”这个字开始成为了网民用来讽刺当今社会现状的又一利器，但随着“甜”出现的频率逐渐提高，一些人开始出来作妖了。

慢慢地，“甜”字不只是出现在和劳动者有关的视频里面，一些人开始大量地在其他视频里面刷“甜”。于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甜”感到反感。一个用来讽刺当今中修统治黑暗的词，在部分人的别有用心下，开始成为了一个烂梗。他们在各大不相关的视频里面刷着“甜”，又在评论区里叫骂着“甜小鬼又来了！”“机器人又触发关键词了？”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即使是在一些真正体现“甜”的视频与文章里面，哪怕只要提到了一个“甜”字，也会被其他人群起而攻之。

这种现象，是否让人似曾相识。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之前的“撅醒者”。这个梗最初来自于一张图片，一个红色视频（不清楚原本的视频内容）里，有着诸如“12岁，已觉醒。”“13岁，今年觉醒。”的弹幕。该梗最初被用来嘲讽一些粉红，但慢慢地，这个梗开始出现在一些新闻评论区下方。比如在北京四中与河南衡水中学的对比视频里，你发送了一条写着：“制度的问题导致了这种教育问题的出现。”过了一会儿，也许就会有人在你的评论下回复到：“又撅醒啦？”“今年8岁，已撅醒。”

最初这种用来讽刺关于“中修”的网络用语，慢慢地都开始被用来攻击左派了，甚至攻击一些对当今社会现状产生思考的群众。如果说这其中没有那些反动派的推波助澜，我是肯定不相信的。他们干这类事情还干得少吗？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扛着红旗反红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保皇派不是最喜欢干这种事吗？毛主席强调不要武斗要文斗，他们就挑起事端，整天到处打架惹是生非，给别人戴高帽，吐口水，唯恐天下不乱。在此之前，邓小平不也喜欢干这种事吗，毛主席要抓右派，他觉得最多在全国抓5000人就够了，他倒好，直接抓了50万。“大跃进”的时候，搞什么亩产千万斤，硬搞浮夸风，还给自己留下了个“稻上飞”的名号。他们这样干，然后改开后又来泼脏水，搞乱群众运动，污名化群众运动。之前的一些工人维权运动中，也有一些人假扮讨薪工人打砸抢，然后对外宣传说什么“工人讨薪”是暴力讨薪。这些事情上，这些反动派还是挺在行的。

但这也说明，他们开始慌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矛盾的必然激化，他们开始害怕了。他们开始管制言论自由，又开始以前那套“扛着红旗反红旗”的老把戏。如今网络上半点风吹草动，就让他们害怕不已，他们的日子也不会长久的。

RSF 编辑部评：

批评的方法不对，斗争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式的、不是坚持阶级立场的，就会变成形而上的批判。这是唯心主义的。这位同志所谓现在出现的“撅醒者”、“甜”的批判词汇被人正反运用正是此类情况，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这种批判，许多自由派对今天的中国和过去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齐打击和否定的，他们就是采取了这种批判方法。

这种批判只能攻击到敌人的一些表面、一些现象，无法真正打击到敌人的本质，伤其根本；并且这种形而上的批判今天可以拿来批判资产阶级，明天也可用来批判革命。因为这种批判不具备鲜明的阶级立场的，也是没有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科学、严肃、且负责任的分析并评判事物的。这种批判方法就会很自然的被人利用起来当作为个人、为小集体谋利益的工具。这种批判在资本主义时期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改良主义的立场，对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抱有否定和修正主义的立场。所以，这种批判方法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立场的方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自由的、散漫的批判。

一切无产阶级和要革命的份子都应该抛弃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采取更科学、更严肃的、更负责任的辩证唯物主义式的批判，并在一切批判中都树立起无产阶级阶级的革命立场。

谈谈“真理标准”

“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关于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既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能从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其认识论的角度，廓清在这个问题上的迷雾，那么，对于揭破某些人的政治操弄、推进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事业，是大有裨益的。一言以蔽之，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不能把它的确定性给绝对化，不能把它给简单化、僵硬化、庸俗化。

一、谈论“真理标准”的前提

——弄清楚“什么是真理”或“有没有客观真理”

首先，我们不能够离开“真理是什么”去谈“真理的标准”，不能够弃“真理是什么”于不顾而空谈“真理的标准”。离开“真理是什么”即真理的概念、定义、实质问题，径直讨论“真理的标准”即如何辨别真理的问题，就很有可能陷入对方预设的逻辑和话语陷阱。

即，当提到“真理”这个我们好像再熟悉不过的词儿时，必须首先做这样一个区分：①“什么是真理”，或者说“有没有客观真理”，和②“拿什么样的标准去检验或判定真理”——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决不能混淆。必须先分开讨论。列宁早就指出：“……关于真理的标准要另论述，不应该把这个问题和有没有客观真理的问题混为一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们还必须补充：只有先回答了前者，才能回答后者；只有弄清楚了“真理是什么”，讨论“真理的标准”才有意义。

比方说，如果有人事先把“对我有用的”看做、规定为“真理”，那么，他再来跟大家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切的谎言、谬论、迷信、偏见，只要在“实践”中“证明”了对他是“有用”的，他就可以硬把它说成是“真理”……不错，这是一种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什么？——本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按照这种美国牌实用主义的反动真理观：美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杀人，因为确实对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有用”“有利”，他们就可以把它硬说成是“真理”；同样，赫鲁晓夫之流的修正主义路线、方针、政策，因为对他们的特权，对他们巩固和扩大特权“有用”“有利”，他们也可以把它硬说成是“真理”……

在这里，“真理”被庸俗化了，甚至可以说是干脆被否定了、取消了、虚无了。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份”的“真理”——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他有他的“真理”——那么，请问这个世界上，哪里还有什么“真理”可言呢？反动分子正是这样把真理

概念庸俗化——结果，弄得他们的世界里，好像到处都是“真理”，实则到处流行着谬误、谎言。“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我们都知道，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说根本问题，乃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又包括两个方面，一主一次：①思维决定存在，还是存在决定思维；②思维能否正确认识存在。我们也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回答说——①存在决定思维，这就站到了唯物论立场上；②我们的思维能够正确认识存在，这就站到了可知论立场上。

那么，到了认识论领域，到了真理观这里，问题变成了什么样呢？①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在真理观上，表现为：真理是不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这个问题，实质上正是“真理是什么”“有没有客观真理”。②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在真理观上，表现为：我们的认识，能不能“一下子”“立即”“马上”“不很久”反映全部真理？这一点，实质上即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真理观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在认识论—真理观领域的体现和延伸。

究竟什么才能叫做“真理”？真理是“认识”之一种。要明白真理是什么，就要从认识说起。大家知道，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认识：在不同的认识中，有的认识是正确的，有的认识是错误的；在同一个认识中，也会包含正确的部分，和错误的部分。真理，就是“正确的认识”，或说“真理性认识”，是认识的正确部分，本质上即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我们把马列毛主义叫做“真理”，为什么呢？决不是因为它是“神秘”东西，也不是因为提出它的人是什么“神仙”，而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及它们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进一步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改造世界。不错，马列毛主义对我们“有用”；但是，须知它之所以有用，就是因为它是世界的正确反映。如果它反映得错误，我们就怎么样呢？就不能运用它制定正确的行动方针，就要失败，乃至灭亡——那它就变成“没用”的了。它并非因为“有用”，所以是“真理”；而恰恰因为是“真理”，所以才“有用”。

但是，有用的，又不一定是真理。比方说，在政治斗争中，谣言和诡辩，确实会对有的人、有的阶级“有用”，他们确实可以利用谣言和诡辩去达到，或部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谣言和诡辩，决不是真理。

一句话：真理因为正确所以有用，但有用的不一定是真理。明白了这些，我们就能明白庸俗实用论者，即极端主观唯心论者，那些打着美国特色实用主义招牌的人，在哲学上荒唐到了什么地步。

二、准确理解实践标准的“唯一性”

实践标准在检验真理的各项标准中，无疑有着突出的，准确说是根本的、一元的地位；但是，又必须承认，一元并不排斥其统率下的多样，还存在着实践标准以外的其他标准，应当区分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和其他标准，只不过其他标准是根本标准的体现、反映、延伸罢了。

比方说，承认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甚至承认它是“根本”的检验标准，决不等于否认或轻视逻辑标准对于检验真理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认，要判定认识是不是真理，逻辑证明也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例如：我们的政策、计划、办法、设计等等，在付诸落实之前，可以而且完全应当从逻辑上对它们加以检验。如果要完全用实践来检验，即完全排斥非实践的检验手段——那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拒绝接受前人的和他人的，以及自己已经获得的实践经验和基于实践的真理，就等于自找麻烦，就等于犯傻。并且，在某些学科中，逻辑的推导和证明还起着主要的作用。

显然，否定或轻视逻辑标准，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能否据此得出结论说：逻辑标准，是和实践标准相并列的，或同等重要的一种真理标准呢？不，不能这样说。要知道，逻辑标准，毕竟只是一种派生的标准。第一，逻辑规则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逻辑规则本身，就是在千百万次的实践中产生出来，并且又是被千百万次的实践检验过的。第二，为了得到正确的结论，逻辑推理的前提，又必须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可靠的知识。第三，对许多事情的认识，逻辑证明也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判定，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判定它的正确与否。第四，有些理论，在一定时期中，似乎只能从逻辑上证明，无法从实践上证明；但是，只要是真理，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终究会以某种方式在实践中得到证明的。

总之，在检验真理的多项标准中，实践的标准，是最重要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决定性的，其它标准在实践标准面前都是次要的、派生的、参考性的。

三、实践标准同时具有不确定性或相对性，

必须辩证地历史地把握它

实践标准，同时具有不确定性，或曰相对性。对于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我们必须做辩证的、历史的理解。实践标准是确定的，是重要的，是根本的——但决不是万能的，决不是什么魔法。承认实践标准的重要性和根本性（唯一性），决不意味着要把它的确定性给绝对化。列宁这样指出：“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就是说，实践标准既具有确定性即绝对性，也具有不确定性即相对性。

怎么理解这个“相对性”呢？这是由实践活动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第一，从实践所处的条件来看，我们人类的实践，必定是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一特定地方，面对一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形势——总之，必定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我们是人不是神，决不可能自己“选定”“设定”“规定”各种条件，然后再进行随心所欲的、完美无缺的实践。我们

是怎么进行实践的呢？借用马克思的话，我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进行我们的实践活动。

革命的实践也是如此，正是如此，更是如此。真正的革命者，跟某些自以为是的改良主义庸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庸俗改良论者，总埋怨说是革命使“千百万人头落地”（不见他们去谴责反革命势力的真正的疯狂暴戾！！），总要幻想一种“设计好了的”、“完美”的变革，总是傻傻地以为人类可以“完全准备好了”以后再投入变革社会的实践……哪里有那么的好事呢？我们在进行变革社会的实践的时候，当然可以“有所准备”，但决不可能“万事俱备”。

因为实践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它本身必定是有局限性的、不完美的；进而，当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时候，它自然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就是说，它并不能“百分百”地检验出真理或谬误。实践标准也只是实践标准而已——它只是它自己，而决不是什么魔法。

列宁提醒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不确定性，并肯定这种不确定性在“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这方面的积极意义——就是说，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我们不能说我们既有的、已经经过一定的实践检验的知识是完美的，不能说既有知识已经穷尽了真理了，不能说它已经是对客观实际的“完全”反映（但又不能因此而否定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价值）。

第二，从实践的主体——人来看，人必定是社会的、历史的人，也必定有其主观局限性，由其主宰的实践活动不能不反映人本身的局限性。西方资产阶级在近代初期，是革命的、进步的，那时候它手里掌握着真理——关于推翻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真理；后来，由于它的阶级局限性，到无产阶级革命兴起的时候，它就不同了，它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实践就不能和社会发展规律相一致了，它的实践就检验不了真理了，它手里就没有真理（而有谬误）了。斯大林是一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跟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根本不同；但他在个人性格方面有不可避免的缺点（其实人都是如此），如粗暴、不那么民主，这些性格缺点就不能不影响他从事的实践活动，不能不使他比较难于掌握一些真理。

第三，从实践的手段（方法）看，由于实践的主体——人是有局限性的，实践的手段作为人的工具，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人本身不可能真的开上帝视角，人用于实践的工具也不是万能的。比方说，我们要用刀削苹果皮，必须遵循一定的刀法，必须正确使用刀，不能乱砍一气；我们改造现实社会，要通过革命的方法，但苏联、西方的革命方法不能直接搬到中国来用，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的情况确定我们的方法。

第四，从实践所指向的客体——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世界来看，它不是静止不动的、僵死的，而是处在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中的。因此，这一刻认识了它，得到了关于它的正确认识（即真理）；下一刻，当它摇身一变，我们又要重新认识它才行。故此，实践虽然有着相对的稳定性，但它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着的。比方说，近代以来，中国这个社会，先是完全的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然后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演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修正主义社会。你看，同样是一个客观对象——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它又变换了好几个

形态，每个形态的性质、特点及由之决定的革命任务、革命路线都有不同。我们必须根据变化着的情况，去认识它，去得到关于它的真理。

第五，很重要的，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来看，实践对认识的检验，往往不是“一次到位”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或者干脆说，所谓“实践检验真理”本身，就是一个过程。特别是，在这个过程的初期出现的某些实践结果，往往不足以判定认识正确与否。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当中，就这样告诉我们：“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如果我们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看斗争已经出现的或尚未出现的最终结局，只根据先进势力的一次、两次失败，就断定指导先进势力的思想“不正确”“不是真理”，那我们就一定是轻率、肤浅、错误而可笑的。

这个道理，可以说，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所雄辩证明了的。

机会主义庸人和马列毛主义者，在对党史的认识上的主要分歧之一，就是：庸人们把党史看做是，并写成是一部“注定胜利”的、“如有神助”的、直线上升型的历史。他们忽略党史内容的丰富性，特别是忽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惊心动魄的历程，实行“去路线斗争化”。其结果，就是把党史庸俗化，把它变成一部庸俗成功学教科书或一碗高级了点儿的心灵鸡汤，用以愚弄普通党员和群众，使大家不能正确把握历史上胜利的原因。

正如“唯武器论”要不得，“唯道义论”也要不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胜利，除了我们具有充分的正义性或说正当性以外，不可或缺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立足实际，在革命的实践活动当中，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制定了相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并用正确路线及其统率下的各个具体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去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那一套东西，推翻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地位并取而代之。而在没有做完这些工作以前，在实践的初期，我们是决不能避免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的。民主革命时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之一。

即便已经确立了正确路线的主导地位，也不能排除党内产生新的机会主义思想、路线和代表人物的可能性，也不是说从此就高枕无忧、不用斗争了。事实上，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确立了它在党内的主导地位以后，特别是在解放以后，依然面临着机会主义路线的挑战，依然与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正因为仍然可能甚至一定还会产生新的机会主义，正因为两条路线斗争仍然存在，正因为机会主义思想和路线的消极影响只能加以最大程度的抑制而不可能完全清除掉，我们的革命实践，当然还可能甚至一定会遭遇挫折和失败；但一度的挫折和失败，这种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实践初期不可避免的暂时性结果，并不能说明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不是真理”。

这就是我们的党史，这才是我们的党史。党的历史恰恰这样告诉我们：实践对认识的检验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充满风险性的过程。在正确路线——即从革命实践中获得的，正确反映了革命实际和革命规律的路线，还没有取代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地位，以及不能跟机会主义路线做坚决斗争的时候，失败是完全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暂时的、“不友好”的实践成果，并不足以证明我们的革命思想“错了”，就是说并不足以说明马列毛主义及其革命理论、革命路线“不是真理”。

四、实践具有主体性问题

必须区分革命的实践和反革命的实践

实践的主体无疑是人。但须知，“人”并不是统一的，或者说人类内部并不是没有差别的。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经过不止一次实践的不止一次检验的、马列毛主义揭示给我们的以下真理：社会是分裂为阶级的，民族是由不同阶级组成的，阶级是有剥削、被剥削之分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是相互冲突的，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无产阶级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后一个专政。

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与人之间最根本、最重大的差别，就是阶级差别。“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实践论》）这就必然导致在社会政治领域，在依然存在阶级的条件下，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相互冲突的实践。革命阶级要维护和扩大自己的阶级利益，要革命，就有了革命的实践；同样，反革命阶级要保住自己的阶级利益，要免于被推翻，就要反革命，这就有了他们的反革命实践。

这时，你说谁的实践才能出真理？——二者必居其一，只能是革命阶级的革命实践出真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真理只有一个”。因为革命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实践活动，和社会演变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而反革命阶级的要求和实践则是逆这个客观规律的。

而在科学实验领域，科学家们的实践虽不具备直接的阶级性，但也总是有先进、落后之分的，没有这个矛盾科学就不能前进了。并且，在社会发展史上，革命阶级总是要跟科学和唯物论结成同盟的，反革命阶级总是要跟宗教和唯心论结成同盟的——这就是说，人们在阶级斗争中，不能不利用科学和哲学为自己的武器，科学和哲学并不能完全“无关政治”。只有代表了科学和哲学进步趋势的学者，只有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实践才能出真理；抱残守缺的旧“权威”的实践，一般地只能产出谬误。

当然，真理和谬误的对立，只在一定范围内是绝对的。反动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这些反面教员们的实践，产出谬误，其实也正是对真理的反面检验。但是，绝不能把谬误说成是真理。如蒋介石宣扬他的“中国之命运”，实际上他那一套并不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及其客观规律的

正确反映，因而不是真理是谬误，他的反革命实践所出的是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及其规律的不折不扣的谬误。

五、区分真理问题和价值问题，

防止堕入功利主义泥沼

上面，我们讲的都是真理问题。但是，我们在生活中所碰到的，又决不止真理问题。实际上，我们经常碰到这样“两类问题”：真理问题和价值问题。我们还经常碰到一个价值问题。

真理问题就是关于“怎么办”的，价值问题就是关于“该不该办”的。比方说，要盖一栋楼，就要研究到底怎么把它盖起来，要有设计规划，必须遵循科学规律。这是“真理”问题。但是，我们该不该盖这栋楼？会不会奢侈了、浪费了？有没有必要？这就是“价值”问题。

这两类问题当然是不一样的，不能把它相混淆，不能避而不谈价值问题。不谈价值、只谈真理，楼就算盖起来了，也会有人要求拆掉，甚至最终会被真刀真枪地拆掉。

RSF 编辑部评：

我们看到有同志比较深刻的研究了关于马列毛主义哲学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行动。关于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方面这位同志说得很好。在实践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实践的阶级性上都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方面。这些是值得吸取的。

但关于这篇文章的问题我们也要指出来。

同志在研究在作文章可能忘记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同志把实践的阶级性谈到了，但是遗忘谈到真理的阶级性。真理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也是具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包括思维科学）总结出来的真理本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的科学真理一旦应用于阶级社会就必然会带有阶级性；社会科学（以及哲学）的真理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而且是特别鲜明的阶级性。资产阶级必然被无产阶级灭亡的真理，是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的。

在第一段末尾：“真理因为正确所以有用，但有用的不一定是真理。”同志在这里说得不是很清楚。“有用”或者说“作用”等也应该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标准，这是第一点；“作用”、“有用”是价值问题不是真理问题。这个价值问题同志在第五段区别出来了，但是第五段却没有说到阶级性的方面。

我们认为第二段也有这样一些问题，如下：

第一，“逻辑标准”这个定义我们认为还不够科学，逻辑一般是哲学中的一种运动的范畴，在本篇文章中同志把这个词用作已被证明的知识的范畴中，又运用在了理论标准中，但“逻辑”这个词除了同志在这两个地方的运用之外它本还有更广泛的科学范畴的用途。

第二，这里要证明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同志说到了实践论、认识论的问题，但又指出了其他非唯一的多元的、次要的标准，这里就矛盾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该用“唯一”的说法了，那就只能是“主要”了。

第三，逻辑标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同志这里用的“逻辑”是也一种提炼出来被证明过的理论，用它来检验“例如：我们的政策、计划、办法、设计等等”的。这里应该用理论指导实践的问题，而不是“逻辑”（实际上同志自己说的“逻辑”的范畴也是一种理论）检验真理的问题。同志弄混淆了。所以在这里应该证明实践与理论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不是“真理标准”、“逻辑标准”与实践的关系。

就如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两段话之间的关系，谈的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斯大林所说的：“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和毛主席所说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也都是这个问题。

真理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它也是被实践证明的，它也是一种理论。所以这里把理论和实践的对立统一分裂出来了，用“逻辑标准”这个内容和“真理”、“理论”具有类似内容的范畴来当作检验真理自身的标准之一。

第四，这些要证明的内容其实和我们马列毛主义已有的理论重复了。在《实践论》的内容里，证明得更全面、更完整。这里只引入片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的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克

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 《实践论》

所以这一段就有定义还不科学、没分清主次要和唯一的区别的问题、弄混了矛盾关系、重复证明、重新定义已有了相似内容的范畴而制造了不必要混乱的问题。

同志在第三段说了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并且引入了列宁的话，说得很好。但是也应该证明它的绝对性的部分。所以这里应该是“绝对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一定的范围内绝对，在一定的范围内不确定。相对就是这两者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就和普遍性与特殊性、无限与有限、对立和同一的关系一样。这才应该更能说明其相对性。列宁那个时期发展了辩证法，突出了矛盾在辩证法中重要的地位，展现出了一些矛盾的规则，并有了很优秀的应用。但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矛盾论，我们今天应该站在革命前辈建立的更高的地方和更好的条件下来分析这个问题，即马列毛主义的条件下，而不能局限于当年那个发展深度。

第四段，同志说实践具有主体性问题，举例出了许多阶级实践不同的问题。那就应该把问题提炼为实践的阶级性，而不应该只是说“只有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实践才能出真理；抱残守缺的旧‘权威’的实践，一般地只能产出谬误。”资产阶级在他允许的范围内也接受真理，同志这里反而把真理的相对性（只存在于一定条件内）忘掉了，自由竞争在几百年前是真理，在今天的环境下则是荒谬。

第五部分 斗争艺术

这部分主要关注革命工作中需要的各种斗争手段或技术。这里整编了一些国内外各方面同志的相关成果的文章，具有很突出的帮助实践作用、推动革命工作的意义。

翻墙原理与注意事项

RSF 编辑部

一. Http/Https 协议原理

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 协议) 是一种超媒体信息系统的传输协议，最常见于浏览 HTML 网页等超媒体。

从技术特征来看，http 协议是一个客户端（用户）和服务端（网站）之间请求和应答的通信协议，主要通过 TCP 连接，将通讯信息发送到目的设备的默认端口上(通常是 80 端口，这是 http/https 协议的一个主要特征)。由于 HTTP 协议是一种明文协议，用以通讯的数据没有经过任何加密或验证，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该协议的隐患主要分为窃听隐患和拦截隐患。(具体隐患及原因在 HTTPS 协议内容处同解决办法一同说明)

超文本传输安全协议 (HTTPS 协议) 是在上文的 HTTP 的基础上加入了 TLS 加密协议的一种传输协议，其具有高的安全性，可以有效防范中间人攻击和窃听。从技术特征上看，HTTPS 协议使用 443 端口而非 HTTP 协议的 80 端口进行信息通讯，并且使用 TLS 协议的密钥对发送的数据进行加密，保障 HTTP 协议发送数据的安全性。

任何 HTTP 协议的数据从客户端到服务端的过程中，都会经过大量的网络设备（网关）中转，由于 HTTP 协议本身并没有对数据进行加密，而是以明文（不需要解密也可以直接观看数据包内的内容）的形式进行传输。在数据交互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网关都可以直接获取所转发的数据内容，因而 HTTP 协议数据在传输的过程中存在被窃听的风险。同时也因为数据包并没有被加密，因而任何一个网关在中转数据的过程中也可以直接篡改数据，因而 HTTP 协议数据在传输的过程中存在被篡改的风险，并且由于 HTTP 协议不会对数据的发送方和接收方进行身份验证，任何网关可以拦截 HTTP 协议的数据包，在篡改其内容后将数据包直接发送回客户端（用户），实现对传输数据的拦截。

HTTPS 协议为了解决这两个隐患，引入了 TLS 加密和 CA 证书两个技术手段。

TLS 加密是基于加密算法所进行的 密钥交换和密钥协商，通过公钥(服务器发送的公共密钥，是公开可被侦查的明文密钥)与私钥(客户端生产的私人密钥，不公开，无法被侦查)计算形成的会话密钥来进行信息传输。TLS 加密一般分为对称加密**（只有公钥）与非对称加密（一端使用公钥加密，另一端使用私钥解密，公钥加密的信息只有私钥可以解密，反之同理）**由于加密使用了随机生产的密钥，使得通过计算暴力破解密钥几乎变得不可能，但由于每次 TLS 加密之前首先需要进行 TLS 握手来获取公钥，且握手是以明文形式进行的，因而使用对称加密的 TLS 加密会因为 TLS 握手导致公钥被泄漏，最终导致加密信息被解密和窃听。而非对称加密时，客户端首先向服务端发送 TLS 握手获得公钥，然后将要发送的数据用公钥加密发送给服务端，服务端收到后根据算法用公钥计算出私钥，再使用私钥对数据包进行解

密，并再把回应的数据包用私钥加密发送回客户端，客户端使用私钥进行解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数据包分别被客户端与服务端用密钥进行加密，因而防范了 HTTP 协议的明文数据被直接窃听的隐患。但同时由于 TLS 握手会暴露公钥，导致通讯过程中存在加密数据的单方面泄漏，目前的 TLS 加密还存在公私钥混合加密来防止公钥直接泄漏问题，但普及性并不高，故具体原理按下不表。

TLS 加密解决了窃听隐患，同时因为加密导致数据包无法被直接篡改内容，但并没有解决数据包被中途拦截并被拦截网关遣返假数据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HTTPS 协议引入了 CA 证书。CA 证书是受信任的权威机构发放给网站的身份证明，颁发的 CA 证书通常包含网站的数字签名，HTTPS 协议在发送和接收数据包时，会对目的设备的数字签名进行验证，确保数据包发送/接收的目的地没有被中途拦截并篡改。此外，CA 证书还包含一个公钥(并非 TLS 加密的公钥)，客户端可以通过使用 CA 证书自带的公钥对 CA 证书的数字签名进行验证，来保证证书的有效性(证书可以被伪造，因此需要二次验证)

虽然 HTTPS 协议在 HTTP 协议的基础上添加了数据加密和身份验证，使得 HTTPS 协议获得了不错的安全性，但仅使用 HTTPS 协议并不安全，TLS 加密的核心是密钥的不对称性，但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直接获取国内网站的密钥计算规则，在公钥的基础上直接计算出私钥来解密传输数据。并且通过国产软件在手机/电脑等设备上植入后门，直接利用漏洞窃取本地私钥来窃听通讯。此外，通过后门在设备本地植入伪装受信的 CA 证书机构，也可以直接在本地伪造 CA 证书来欺骗证书验证，实现被浏览网站的冒充与拦截。

二. Socks5 代理技术原理

Socks 协议与 HTTP 协议类似，都是数据传输协议，但 HTTP 协议是通讯协议，SOCKS 协议是转发协议，其技术原理如下:通过 TCP 握手与代理服务器进行通讯，而后将要转发的数据包首先转发至代理服务器，再有代理服务器发送到数据包的目的地(数据包返回过程同理)

需要注意的是:SOCKS 协议本身只是转发协议，并不提供加密，因而 SOCKS 协议的转发并不会增强数据包的安全性，一切 SOCKS 协议代理都不具有匿名性，都是可以被追溯的。

目前主流的 SOCKS 协议翻墙代理(逃避 GFW 防火墙对网络数据的审核)是基于 SOCKS5 协议进行的代理

常见的代理类型有:

Shadowsocks/ShadowsocksR

V2ray

Trojan

前两种代理是基于 SOCKS 协议的转发代理，并通过协议算法将代理数据包进行加密，使得 GFW 无法解包审查数据包内的具体内容，又由于转发数据的代理服务器不在 GFW 的拦截名单上，故 GFW 会对代理内容进行放行，从而实现逃避 GFW 对数据包内容的审查而将数据发送到墙外。

但这两种代理由于要对数据包进行加密，且加密的形式十分有限，导致数据包的特征十分明显，现已证明这两种代理的数据包可以被 GFW 完美识别，故这两种代理协议现已并不安全。

Trojan 代理是在 SOCKS 协议的基础上，使用 HTTPS 协议对数据包进行伪装，使代理数据包在形式上同正常的 HTTPS 协议的数据一样，这使得代理数据包能够隐藏在互联网上庞大的 HTTPS 数据包流量中，让 GFW 错误认为代理数据包只是正常访问伪装成正常网站的代理服务器，从而躲避 GFW 的审查。

这种代理模式具有较高的隐蔽性，但由于其代理模式的单一性，容易被 GFW 的主动探测审查到，故也并不安全。

以上三种主流的 SOCKS5 代理协议都存在固有的协议性缺陷，可被 GFW 轻易识别，但这三种代理的缺陷不仅在于此，目前流行于中国大陆的 SOCKS5 代理都存在服务商隐患(不论是 xx 云或者是 xx 机场)。一方面绝大部分的代理数据都要经过有审查的出口 BGP 和香港中转服务器，使得这些转发数据实际上毫无隐私可言，可以被中国政府直接获取到。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可以使用微信/支付宝支付购买来获得的 SOCKS5 代理服务实际上都是实名制的代理，中国政府可以通过监视支付记录清楚的知道何人购买了代理，并通过对代理服务器的上游提供商或者代理服务的服务商施压来获得后台数据，从而调查个人的翻墙记录。因此，应该尽可能的不要使用 SOCKS5 代理翻墙进行敏感活动，否则极有可能在后台留下活动记录。如果没有很好的翻墙方式，应当选用诸如 TOR 之类的加密工具加密自己的网络访问流量，并尽可能的不使用香港的服务器。

三. VPN 与 VPN 代理

虚拟专用网 (VPN) 是一种通过 VPN 协议与技术手段构建起来的虚拟网络链路，与中文互联网语境下常说的 VPN 代理不同 (这里包含了 SOCKS5 代理，但其与 VPN 实际上毫无关系)，VPN 实际上是通过使用专用线路或在现有网络上使用隧道协议创建一个虚拟的点对点连接而形成的网络链路，因其具有高度的保密性，且对数据的访问人和数据的完整性有较为严格的要求，成为各政府或企业用来远程访问专用网络的一种手段，VPN 因其内部传输的信息加密且不暴露在公共互联网上，往往不会被 GFW 审查，故而常被人用来当成翻墙手段使用。VPN 不能使在线连接完全匿名，但它们通常可以增加隐私和安全，可靠的 VPN 不用担心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泄漏或被劫持，没有访问权限的人也很难连接到 VPN 服务器。但是，VPN 由于其协议的具有很强的特征性，且并非为了逃避数据审查而设计的初衷，导致其流量包极易被检测或注意到，即使使用 VPN 可以让使用者的 IP 地址被隐藏，但仍然可以通过跟踪 cookie 和设备指纹仍然可以找到使用者。此外，

VPN 的可靠性和保密性完全依赖于 VPN 服务提供商，目前国内外存在大量的钓鱼执法 VPN(例如老王，蓝灯等)通过提供 VPN 服务窃取翻墙者的翻墙行为及隐私，因此仅建议使用比较知名的国际 VPN(比如 EXPRESS VPN)作为备用的翻墙手段，且必须考虑购买 VPN 的支付问题，极其不推荐使用所谓免费的 VPN 进行网络活动。

一些注意事项

1. 目前中国大陆的网关(比如路由器，小区网络基站)都带有窃听和侦查的网安后门，在使用代理工具进行翻墙时应切记谨慎行事，尽可能不留下明显的身份信息(比如使用代理加 TOR 浏览器，并定期清理浏览数据和 cookies)，在境外互联网不要贸然发言、留下活动痕迹或使用与墙内身份有关的网络身份，不要暴露自己。
2. 目前中国大陆生产/销售的移动设备(华为/小米)都自带合法监听(包括上网记录和麦克风)，且腾讯公司的 QQ、微信等软件也已经被证明会读取设备的浏览记录和扫描本地文件，应当尽可能使用未安装国产软件的设备(最好是安装了 LINUX 系统的设备)进行翻墙活动，并定期清理数据。
3. 在选择翻墙方式时谨慎选择，不要贪图便宜或方便，不要使用免费的翻墙软件(极有可能有后门)
4. 出于安全目的，可以自行在 youtube 等网站详细了解翻墙的相关知识，自行掌握更多安全技术，一切网络活动以安全为第一位。